



武进博物馆
2017/2 总18期



常州市市长丁纯、副市长方国强、武进区区长戴士福一行调研我馆



博物馆党支部赴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参观



“常幼牵手武博·非遗走进校园”签约授牌仪式



江苏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示范项目评选展示



“七彩夏日——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活动



“我们的节日——欢聚武博·喜迎中秋”社教活动



“我们的节日——武博走进夕阳红·弹奏古音享天伦”联欢会活动



“11·9消防日”消防安全疏散和灭火演练

明漆纱发冠



直径10.3厘米、高5.6厘米,重133.42克。

发冠以覆有黑色绉纱的银丝编织网罩为框架。冠前中部以金佛像为挑心簪首,金佛盘坐于金莲之上;金佛像之下饰有一条由11朵梅花组成的弧形带状金饰,梅花花蕊皆以珍珠点缀,均腐蚀剥落严重;冠后下部有一月牙形云龙纹金饰作为

分心,工艺十分精美;冠顶中部有一金质葵花顶簪,葵花四周由四花四蝶环围合抱组成“蝶恋花”装饰纹样。

此发冠1997年出土于武进横山桥王洛家族墓。出土时有额帕箍住,两侧各有两根包金银簪将冠固定在发髻上,是非常难得的出土时即插戴完整的髻髻和头面首饰。发冠集金、银、宝石于一体,采用锤髹、累丝、镶嵌等工艺,精妙绝伦,保存完整。此发冠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明代工艺技术发展的重要实物。为我馆二级藏品。





武进博物馆
2017年第2期

2017年第2期

总第18期

顾问:徐伯元
毛健林

主编:施建刚

副主编:张彩英

编辑:张彩英
殷洁茹

编委:王颖 张彩英 芮路俊
张宇 金霆蔚 施建刚
唐学军 谭静芬
(排名按姓氏笔划)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武宜路
(春秋淹城旅游区内)

网址:www.wjmuseum.net

邮编:213164

电话:0519-86310589

电子邮箱:czwjmuseum@163.com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D207

印刷:常州市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学术研究

- 01 江南灵秀 荟于一城
——对淹城遗址文化的探究与保护的思考 许佳
- 05 淹城溯源 吴洪生
- 07 小梅岭玉石矿与良渚文化玉料来源再探 曹昕运
- 12 尹湾汉墓简牍所见丝绸之路史事 朱磊

文物鉴赏

- 15 火淬陶土瓷源韵
——淹城出土的原始青瓷鼎 施建刚
- 17 云鬓轻拢妆高髻
——明代漆纱珠翠庆云冠 芮路俊
- 18 江苏溧阳城西公社上阁楼大队明墓出土金饰选粹 张剑
- 19 康熙临董其昌书《龙虎台赋》御碑 罗志
- 21 武进地方名刻
——《咏如刘先生风雪长征图》简介 张军

地方史研究

- 23 由金国金印追溯湖塘镇抗元斗争史迹 夏星南
- 24 晨钟暮鼓话直街
——北大街前世今生 徐伯元

名师风范——李公朴纪念专题

- 26 为了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主斗士李公朴 山川
- 28 李公朴的先见之明
——读李公朴的《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冯士彦
- 31 生而公仆 汤语琳

工作论坛

- 32 两种数字化采集技术在可移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张彩英

目录/Contents

36 小议基层文物宣传工作
——以高淳区文保所为例

邹荣建

40 纸本古籍的改装鉴别初探

朱煜

社教风采

44 许“新”愿·绘美“锦”——博物馆里过大年

45 “搓元宵·做花灯·听古音”——博物馆里闹元宵

46 “我们一起过端午”武博端午节活动

47 欢聚武博·喜迎中秋

48 武博情暖夕阳红,携手种好幸福树

49 跳动的指尖非遗——“几何人生·乱针绣手工创意”活动

50 “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

51 “一沙一世界”武博暑期沙画体验活动

52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花儿朵朵开

53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蝴蝶翩翩飞

54 五一长假第一天,我去宋代健个身

55 小小设计师们的欢乐周末

56 健身小达人的博物馆课堂

57 博物馆的客家之旅——土堡诞生记

58 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

王丽娜

展苑集萃

59 银装霓裳——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

60 地道常州味——常州吆喝非遗展

61 客家探秘——福建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展

62 “阳湖墨韵”丁酉重阳书画展

63 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

64 情系武进 笔绘家乡——何文斌书画篆刻展

65 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时尚生活展

66 十年回眸——未君中国画作品展

67 “彩墨共舞”柳新生、王云龙书画联展

金鑫蔚

武博纪事

金鑫蔚

江南灵秀 荟于一城

——对淹城遗址文化的探究与保护的思考

许佳



图一 淹城遗址航拍图

里;外城为不规则的圆形,周长5里;另有外城郭,周长7里,与《孟子》中提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相符。淹城形制较为规整,有规整的三道城墙,特别是子城和内城都呈方形,这说明建城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与《考工记》中的周王城图相符。淹城的城墙,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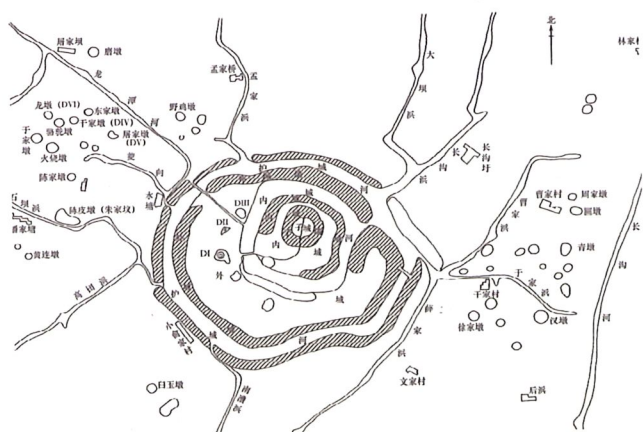
一、厘清现状——盘点古城遗址神韵

淹城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西南,距今约有2800多年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形制最奇特的地面城池遗址。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被列为太湖风景游览区的重要景点;1982年3月,被列为江苏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淹城遗址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4月,淹城被评为“中国第一水城”。法国“中国之家旅游团”赞其为“中国文化古迹的一颗明珠”。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认为“其开发价值不亚于秦始皇陵”。^①淹城遗址规模宏大,形制奇特,在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淹城遗址地势较高,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有民谣曰:“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它有三重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子城、内城和外城,每一道城墙都有护城河环绕,三城三河,墙河相依。子城呈方形,周长1里;内城近似方形,周长3

用开挖护城河所出之土堆筑而成,其方法是从平地起筑,因淹城土质粘性较大,故筑城墙时不挖基槽不经夯打,一层一层往上堆土,有的地方铺一层干土、铺一层湿土,依次相同,不以板筑,故城墙较宽。目前,淹城的三道城墙均呈梯形,上宽8—13米,墙基宽32—43米,高3—6米。护城河河宽30—50米不等,水深平均4米左右,河水清澈,常年不涸。外城河深而宽广,清道光《武进阳湖合志》载“广可十五丈,深亦不减三丈”,实测其河面宽度平均为50米,最宽处的龙潭(又叫龙泉)一带达80米。^②这种建筑形制,在我国古城池遗存中可谓举世无双。因为当时的城池大多只有一城一河,少数是两城一河或两城两河,而“三城三河”者,仅此一处。它的建筑形式,不仅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智慧和创造,而且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证据,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图一)

淹城三道城墙之间,现均有一土坝相通,但这三道土坝筑于20世纪50年代。春秋时进出淹城没有陆路,而是水道划船(独木舟)进出。其走向为:在外城墙的偏西处进口,



图二 淹城遗址平面图

沿着脚墩、肚墩、头墩的西侧向南，靠头墩时，有两处沿头墩的南北两侧东折进入内城河，这条河道又沿着内城墙现今的出入口进入子城河。外城门和内城门均为水门，淹城完全由水道进出。(图二)古淹城的三城三河相套的建筑形制以及城市水上交通、水门的建设等都明显具有南方特点。因为只有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这种城市建筑形制的存在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由此进一步得见古代人们是力求做到城市建设和所在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

子城门位于子城墙南部正中位置，宽约2米。子城内原有一茅庵，何时始建已无法查考，相传是奄王的宫殿遗址，茅庵在抗日战争中被毁，现存清康熙三十年(1661)重修古刹石碑一块，上有残留文字：“……淹溪古迹，曲水环绕，苍松郁秀，颇有空山无尘绝俗之境。”



图三 头墩

淹城内外原来土墩连片，外城内有3个较大的土墩，俗称“头墩”、“肚墩”、“脚墩”，高度在15至20米之间，面积分别为7亩、3亩、5亩。传说是奄王杀其女分葬处。《越绝书》载：“东南大冢，奄君子女冢也。”^③(图三)民谣称：“内高墩、外高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中兀立王女墩。”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淹城城内外的这些土墩是在江苏南部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流行的土墩墓。城内为一墩一墓，可能为贵族墓葬；城外为一墩多墓，可能是平民的家族墓葬。土墩墓发掘结果表明江南地区当时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曾出土2000多件文物。其中有春秋时期的独木舟4条，被誉为“开天辟地第一舟”；出土春秋时期的青铜器20多件，以及大量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文陶器。部分出土文物具有鲜明的吴文化特色。(图四)



图四 三轮双兽盘

二、追本溯源——探寻古城历史足迹

关于淹城的最早历史文字记载是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城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常武地区，在春秋时称延陵，至汉改称毗陵，春秋时期为吴王寿梦四子季札的封邑。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地。”《史记》云：“吴公子季札所据，是为延陵之邑。”吴为越所灭复属越，到战国时越为楚所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地”。清代《读史方輿纪要》云：“淹城，在(常州)府东南二十里，其

城三重，壕堑深宽，周广十五里。”除此之外，常武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亦有零星的记载，如宋《咸淳毗陵志》云：“淹城在阳湖延政乡”等。

尽管东汉以来对淹城不断有记载，但真正对其进行考古研究，只有近70年的历史。1935年卫聚贤、陈志良等考古学家首次对淹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居民的活动遗存，并发表了《淹城访古记》一文，使淹城重为世人所知，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5月至1991年8月，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对淹城进行了为时6年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积累了一些珍贵的考古资料，为全面研究淹城和常州的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淹城的性质和早期历史，目前根据学术界研讨的成果和历代记载可归纳为6种观点：1、淹城是商代江南土著奄族人所筑。奄族原居于淹城一带，后迁徙于今日的山东曲阜。2、周成王东征时，奄人徙于江南始建淹城，作奄国都之用。3、淹城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时吴国所筑，作囚越质子之用。4、淹城是春秋晚期吴国季札所筑，作延陵邑治用。5、淹城是春秋早期吴国所筑的都城。6、淹城是春秋晚期吴王阖闾时吴国所筑的军事城堡，作吴内河水军训练基地之用。持以上诸观点的研究者们提出的理由莫衷一是，然而均有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依据。肖梦龙在《淹城吴都考》中谈到：“淹城所体现出的吴文化特征是多么典型强烈，而它对晚期苏州都城建设之影响又是何等深刻，先后的嬗变规律明显可寻。因此我们认为淹城当是吴国中期都邑。”其理由：一，淹城出土遗物完全呈现吴文化特征，为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优秀代表；二，淹城三道城墙建筑方法均同土墩墓的营造，即累土成垒，非经行夯，这又是吴文化建筑学上的一个地方特点；三，淹城布局为王都建制，同时特别具有军事防御功能，这也是吴都建筑上的显著特点，对以后苏州城的建立有着直接影响。^④

然而笔者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来探究淹城的历史。因此，根据诸多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综合考证，笔者认为：最早居住淹城的是奄族，迁至时间为西周晚期；春秋晚期淹城属吴时，淹城成为季札的封地，是延陵邑初治所在；吴王阖闾伐楚返国后，出于形势所迫，迁延陵邑治于今江阴申港，遂将淹城改作军事防御设施之用；西汉时淹城曾作毗陵邑初治。^⑤

三、保护传承——彰显古城文化魅力

每个中国古代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对淹城遗址的调查、勘探及发掘是常州市开展的最重要的城市考古工作之一。淹城遗址的城市考古为我们复原常武地区古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面貌，剖析城市演进中的个性特征及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研究古代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考古与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工作逐渐成为近代考古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考古与文明社会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这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考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城市考古由来已久。著名的意大利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开创了世界城市考古的先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我国考古学者在河南安阳开始了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从此亦揭开我国城市考古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西安、洛阳等古代城市考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相当的投入，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众多成果。^⑥镇江市古城考古所所长刘建国先生认为：城市考古谱写的“城市史”，不同于一般史学、地学的城市史，前者是以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及各种文化信息，通过分析判断，揭示出某一城市千百年来历史变化和兴衰过程，有些实物资料要比历史文献记载确切、实际得多，其自身价值，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⑦

淹城作为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包含了逐渐积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其保护工作不容忽视,除了需要专业考古人员开展城市考古调查以外,还需要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武进区人民政府根据“保护、考古、修复、利用”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原城内的居民已全部搬迁至城外。同时,相关部门为整治遗址范围内部的环境问题做出了持续的努力。1985年9月,武进区在遗址附近成立淹城博物馆,开展遗址的管理和保护工作。然而,我们强调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的保护,就不仅仅是指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通过规划等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追求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自身的文化内涵与周围景观的和谐一致^①。武进区相关部门还应努力控制遗址周围环境,完善绿化,保护原有的自然环境,使其与遗址的文化价值和諧统一。

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壮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一个城市要想区别于其他的城市,就必须坚持这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将文化视为城市发展的灵魂,这样才不会被卷入城市同化的浪潮。俞伟超先生说“只有人类才能产生‘文化’,使前代积累的能力(当然含知识),能通过‘文化’的传递而代代积累,使‘文化’得到发展。”^②历史悠久的淹城遗址无疑是保护和传承常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突破口。淹城虽为历史遗址,但并不乏现代文化的生机。为了丰富淹城旅游的文化内涵,武进区特别成立了淹城春秋文化研究会,举办学会研讨和参观考察,积极撰写学术报告。武进区还度身打造了《烟雨春秋》舞台剧,并请著名文艺家乔羽和徐沛东作词作曲、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淹城之歌》。拍摄了30集电视剧《春秋淹城》,讲述春秋末期的淹城,在楚、吴、越三国争霸的夹缝中艰难求存的故事。此外,武进区还围绕一系列历史文化资源在淹城附近兴建了博物馆和名人馆。^③深入挖掘馆藏的淹城遗址出土文物资源,开展考古调查,邀请国内外专家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正

是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春秋淹城博物馆)近年来的努力方向。笔者建议春秋淹城旅游区管委会利用淹城现有的三城三河建筑形制的特征,定期组织中小學生,开展历史文化考察与学习;每年在遗址附近举行一次当地民俗文化表演,例如戏剧演出和婚俗展示;在常州举行一系列的国际和地区会议,如“亚洲古城文化开发与发展峰会”和“中华春秋文化交流会”等。

城市考古以探寻城市的“昨天”为宗旨,为“明天”城市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在淹城遗址的城市考古中所发现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可进一步加以开发、利用,为推动和拓展常州经济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常州城市文化发挥独特的作用。我们应该要让城市考古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到古代遗址的整体保护中来,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许佳:武进博物馆考古学术部。

参考文献:

- ①肖飞:《千古之谜话淹城》,《民主》2011年第8期。
- ②彭适凡;李本明:《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 ③李洪兴:《淹城遗址》,《江苏地方志》1996年第1期。
- ④肖梦龙:《淹城吴都考》,《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总第112期。
- ⑤林志方:《淹城早期历史探秘》,《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06期。
- ⑥刘建国:《城市考古学导论》,《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 ⑦贺云翔:《在名城建设中崛起——镇江城市考古侧记》,《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 ⑧单雾翔:《关于大型古代城市遗址整体保护的思考》,《考古》2006年第5期。
- ⑨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 ⑩黄娟:《从淹城谈常州的城市文化复兴——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对策研究》,《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26期。

淹城溯源

吴洪生

淹城，名之为“春秋淹城”的理由，盖在《越绝书》之书名“越绝”二字，以及《越绝卷第二》上二十二个字：“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因《越绝书》乃东汉袁康、吴平所作，故沿用“毗陵县”三字。西汉之“毗陵县”，即“春秋时期”季札封邑“延陵”，西晋末以毗陵郡封东海王世子司马昆，为避其名讳改称晋陵郡，毗陵县并改为晋陵县。现为江苏省常州市。

“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意思为：毗陵县南边的那座城，本来是古代淹君的地盘。

“淹君的地盘”就称它为“淹城”。“淹城”之名即由此而来。

“毗陵县南城”——淹城——今人不称“西汉淹城”，而上溯500年前之“延陵”，称之为“春秋淹城”。窃以为尚可商榷。

因为，“春秋”（其实这里是春秋末年即吴越春秋），还远不是“淹城”的源头。

“古淹君”何许人也？关键在“淹”字。

古人的字少，一字多用，通解字是常有的，同（近）音通解、偏旁通解尤其多。

“奄”，《说文》：“奄，覆也。大有余也。又欠也。《广韵》衣俭切。”；《汉语大字典》：“同‘掩’。掩藏；关闭；《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八》：‘隐情奄恶，蔽谄其上。’；清龚自珍《孝珙手抄词·导引曲》：‘无情绪，无情绪，寂寞奄重门。’古国名。姓。”。

“淹”，《说文》：“淹，水。出越嵩徼外，东入若水。《广韵》衣俭切。”；《汉语大字典》：“通‘掩’。南朝梁江淹《娼妇自悲赋》：‘去柏梁以淹袂兮，出桂苑而敛眉。’姓。”。

《汉语大字典》上明白：“奄”同“掩”，“淹”通“掩”；“奄”

与“淹”均可作姓；且读音相同，《广韵》衣俭切。那么，“奄”通“淹”当无疑。

“奄”之为“淹”有史实。西周初期，山东的“奄君”到了江南“淹城”成为“淹君”。典籍《尚书》、《吕氏春秋》、《孟子》、《史记》等均有明确记载；丹徒出土的“宜侯矢（读zhi）簠”之铭文，及淹城独木舟的C-14测定，与淹城大埂墩、干家墩的土墩墓，均可见证这段3000年前的历史。

武王灭纣之后，包括奄国的商朝原部分属国时有叛乱，武王曾东伐淮夷。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封禅书》）成王年幼，管叔等“三监”不服周公摄政，伙同奄君煽动原纣王子武庚叛乱。公元前1041年前后，周公两次平叛，最后将奄族的叛乱余孽“逐之江南”交给“宜国”监管，奄族残部便从山东曲阜流亡到现在淹城这块地方，拓荒建国。

近读《元圣周公全传》：“三年东征犹如疾风暴雨席卷了黄河下游地区，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奄、薄姑一部分南迁；奄的一部分迁到了今江苏省武进界，并在此建立了淹城；徐的一部分迁之今江西；嬴姓西迁；楚逃至丹水流域，这是我国先秦时期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①

既然“古淹君”即“古奄君”，“古淹君地”即“古奄君地”；既然“西汉淹城”可以上溯500年誉为“春秋淹城”，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再上溯500多年，誉之为“西周淹城”呢？

其实，“古奄君”、“古奄国”，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更远。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尚书》。《尚书》所记，上起传说中的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历史。然而，《尚书》的作者以及写

作和编辑年代已很难确定。流传至今的《尚书》包括《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两部分。学术界一致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传说是秦、汉之际的博士伏生传下来的。故《尚书》非信史，其中记载的“古奄君”、“古奄国”的史实，只能“仅作参考”。

《竹书记年》，古代编年体史书，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的战国时魏墓中发现。凡十二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299年）为止。学术界公认，《竹书记年》是现今所知起始时间最早、编纂时限最长的编年简史。清末学者王国维据以补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并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我们来看看它所记载的“古奄君”“古奄国”史实。

《竹书记年》中记载：成汤建立商朝，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代均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仲丁、外壬二代建都于囂（今河南郑州）；河亶甲建都于相（今河南内黄）；祖乙、祖辛、开甲、祖丁四代建都于庇（今山东鱼台费亭）；南庚、阿甲二代建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东二里之奄里），盘庚由奄迁都于殷，273年后至商纣王，殷商灭亡。这里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奄，曾为商三代都城。

《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奄里，即奄国之地也。”《山东通志》也云：“奄即曲阜旧城址，谓之商奄。”《说文·邑部》云：“奄国在鲁。”奄的地盘在今山东曲阜周围。“曲阜之地，自神农氏建都于曲阜，蚩尤、后羿及商、奄均曾建国于此。”^②“正因为奄地是一个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都，又曾为三代殷王朝古都之地，因而这里经济比较繁荣并有坚固的城堡，所以奄也就成了东夷中最强大的一支，在这次东方叛乱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③

西周初期的（公元前1044年）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联合“三监”（成王之管叔、蔡叔、霍叔，本为监督武庚而设）以及商的属国奄、徐、楚等大举反周。公元前1042年，周公杀武庚平定“三监”后，旋即挥师东进，“伐奄三年讨其君。”《孟

子·滕文公下》）古人不主张赶尽杀绝，周公“杀其身，执其家，漕其宫”（《尚书大传》），杀死了奄君，捣毁了奄宫，将奄的贵族和部分遗民南迁到淮夷（今淮河下游一带）定居。不料次年，奄族再次联合淮夷与徐国叛乱，周公协助成王再次伐灭了奄。“由于奄是除武庚之外的东方主要叛国，势力强大，又与徐夷、淮夷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故周公灭奄后便留下伯禽在这里镇守，不久伯禽就受封。”^④最终，“奄的一部分迁到了今江苏省武进界，并在此建立了淹城”（见上），淹留（淹城、留城之说由此而起）生息，再无生事。

由此观之，“古奄国”，大约3300年前就成为殷商王朝的都城。大约3058年（公元前1041年）左右西周成王时期，奄君因参与东夷叛乱被周公伐灭，最后将奄族的叛乱余孽，“逐之江南”交给“宜国”监管，是为淹城；春秋中晚期，“吴”灭了“宜”，“越”又灭了“吴”，不久“越”又被“楚”所灭。淹城，历时上下近600年（西周约1058—770=288年，春秋约770—476=294年，计582年）左右，作为一个政体（或曰“国中之国”），奄国消亡了，仅留下奄族的遗民后裔及三城三河的遗址地貌。

倘若要为历时上下近600年的淹城溯源，是按其下限时间称为“春秋淹城”好呢，还是按其上限时间称之为“西周淹城”确实呢？窃以为，后者更见其悠长的“历史价值”；淹城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何况还有“夏墟淹城”^⑤一说呢。

吴洪生，隍里高中退休教师，副高职称。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注释：

① 姬传东：《元圣周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元圣周公全传》，新华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101页。

② 参见何光岳《周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第476页；《元圣周公全传》第94页

③、④ 《元圣周公全传》第94页

⑤ 《夏墟淹城》，王黎明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小梅岭玉石矿与良渚文化玉料来源再探

曹昕运

一、小梅岭玉石矿简介

1982年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区域调查队钟华邦工程师在溧阳小梅岭地区发现了透闪石软玉矿床。1990年,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溧阳小梅岭联合调查,正式发现了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栖霞组镁质大理石岩接触带玉矿,这也是迄今在江浙一带发现的唯一玉矿。小梅岭玉石矿为典型的透闪石,种类有白玉、青白玉、青玉和碧玉。当今考古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所用玉料的硬度与此矿石相当,良渚文化玉器来源于溧阳软玉,但仍存在一些争议。

杨伯达先生在《丁沙地遗址出土“玉角”考——溧阳小梅岭玉及句容茅山石即瑶琨》中表示,战国时期的《禹贡》中所载“东南之美玉”瑶和琨,说的就是溧阳梅岭玉和句容茅山石。闻广先生在《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的续进展》中确认梅岭玉石矿是南京市浦口营盘山崧泽文化和江南不少崧泽、良渚文化玉器的来源。蒋卫东先生在《良渚玉器的原料和制琢》中也认为“可以初步判断,太湖流域的史前玉料的原料应当产于本地区的天目山脉、宜溧山脉及茅山山脉的个别山体中。”但中国地质大学李晶等在《江苏溧阳软玉与良渚文化庄桥坟遗址出土软玉的特征对比研究》一文中提出,良渚文化庄桥坟遗址出土玉器与溧阳软玉样品不同。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溧阳市普查办在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西北约300米处的采石宕口发现小梅岭玉石矿。该采石矿洞已废弃,仅存100平方米左右的水池,大宕口长18米,宽9米,小宕口长6米,宽2米。其GPS坐标为北纬31°11'00.9",东经119°24'30.9",海拔115.2米。该采石矿是最近几十年的采石矿坑,至于是否有新石器时期的采矿遗址,目前还未发现。最近,在与小梅岭一脉相承的安徽广德下寺境内的庙西山上也发现了玉石矿,是小梅岭玉石矿脉的延伸,已小规模开采。可见,小梅岭玉石矿的矿脉勘探还不全面,在良渚文化甚至更早时期,肯定比现在的分布范围大得多。

二、古沙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简介

(一)古沙河简介

古沙河,发源于安徽省广德县的仙人、木子两芥,与溧阳县境内的石龙芥、李丰芥、西塘芥等山芥峻岭,总计48条涧溪汇合而成。古沙河干支流全长46.5公里,其中钓鱼台山以下(即今水库以下)8公里。不包括钓鱼台山以下,集水面积148.5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今天溧阳市天目湖镇、戴埠镇,还包括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的部分区域。沙河水系属戴埠河的一大支流,向东北7公里与戴埠河(旧称戴溪河)汇流

于新桥上游,向东北延伸至百家塘,再分注宜兴市屋屋溪、溧阳市南河(旧称胥溪河)入太湖。

沙河流域,地形由南向北倾斜,山高坡陡,地形狭长,下游为平原圩区,河道狭窄,洪水易于集中。每年汛期骤降暴雨时,山洪暴发,洪水瞬时直泻而下,常酿成洪涝灾害。1958年9月7日,为解决沙河水患,在沙河流域开工兴建沙河水库,1961年主体工程竣工,古沙河的中游和部分支流都淹没在库底。1972年12月15日,从沙河水库溢洪闸开始,对古沙河的下流以老沙河为基础,进行全线拓浚,并裁弯取直。

(二) 东陵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地层和遗物

东陵位于古沙河下游,位于沙河谷底中,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开挖砂矿,揭露出厚达8米左右的全新世中晚期沉积,其中②—④层属于良渚文化时期,时代约4700—5000年。东陵砂矿剖面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古沙河流域植被为常绿—落叶阔叶林,并有较多竹子生长,气候温暖多雨,略好于现代。在第②层黄色中粗砂中出土了石斧、石锛及三足陶鬲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在第③层黄色砂中,出土含带柄斧、有段石锛及陶器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

(三) 溧阳市文管办库藏文物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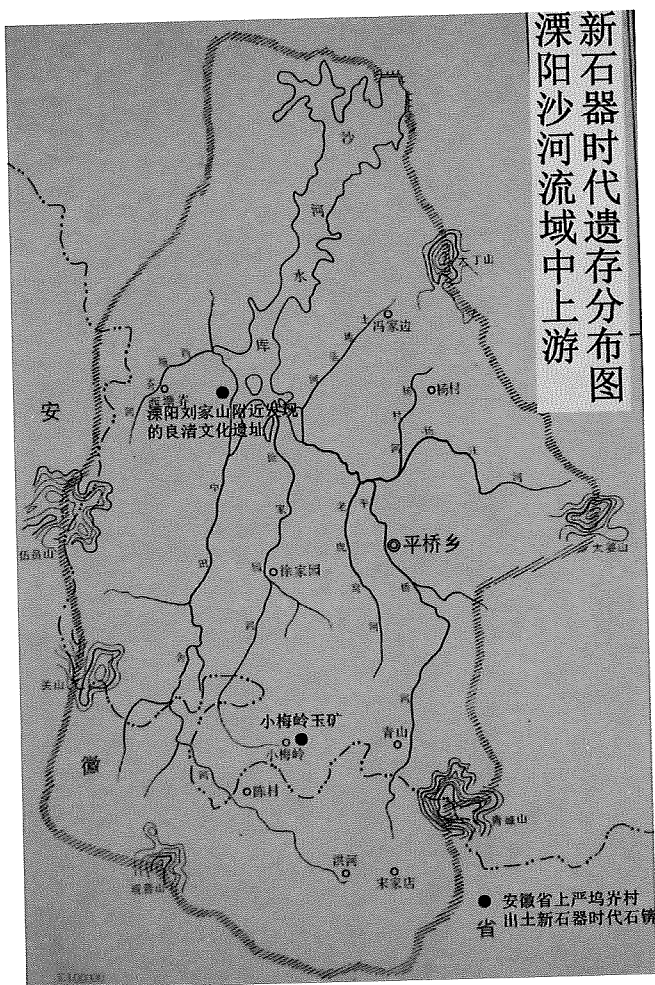
据统计,溧阳市文管办库藏的,除了考古发掘物以外,历年采集的溧阳地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共有82件,其中骨角器3件,陶器3件,玉器2件,其余均为石器。其中古沙河流域采集新石器时代文物53件,占到了总数的64.6%。

(四) 古沙河上游新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

2009年11月—2010年3月,在溧阳抽水蓄能电站考古发掘中,南京博物院在对溧阳市天目湖镇吴村村委桃园村的刘家山土墩墓的发掘中发现,此墓的人为堆积用土是从附近搬运而来的。在此墓第①—⑤层都出土了较多的夹砂红陶片,特别是在第③、④层出土了一些器形可辨的陶片,属典型的良渚文化时期陶器,有鬲口沿、鬲足、鼎足、支座等,说明在2009LWLD1附近地区存在有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类遗存,并且内涵较为丰富。

三、溧阳古沙河流域与小梅岭玉石矿关系探究

(一) 从地理位置来看:



古沙河的上游支流徐家园河就起源于小梅岭玉石矿所在的山区。古沙河的另一条重要支流中田舍河则源于安徽省广德县的仙人、木子两芥,然后南、西两面呈半圆形环绕小梅岭玉石矿,距离徐家园河最近处仅有1.3公里左右。此外,中田舍河源头仙人芥东侧约6公里处的安徽省广德县新杭镇砖桥陈家边村上严坞芥村,1985年11月,村办采石场在此采掘花岗石料,于地下1米深处出土大型有段石锛3件。石锛之大,制作之精致,实属罕见。1994年,三件有段石锛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一级文物。

中田舍河与徐家园河汇合于山丫桥附近。山丫桥民国24年(1935)有山丫桥乡,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此桥为“三丫桥”,现已沉入沙河水库。天目湖镇吴村村委刘家山附近的良渚文化遗址就位于山丫桥西边不远处,距离小梅岭玉石矿直线距离仅6.5公里,两者之间可以通过水路联系。该

遗址的出土器物有：

序号	名称	时代	特征	考古编号
1	石铤	良渚文化	长5.6厘米,宽2.4厘米,厚1.1厘米,完整	LWLD1④:2
2	有段石铤	良渚文化	长4.7厘米,宽4.5厘米,厚1.2厘米,完整	LWLD1③:1
3	石铤	良渚文化	长6.5厘米,宽2厘米,厚0.8厘米,完整	LWLD1④:4
4	石铤	良渚文化	长7.3厘米,宽1.8厘米,厚1.8厘米,完整	LWLD1③:2
5	石凿	良渚文化	长14.8厘米,宽4厘米,厚5厘米,完整	LWLD1④:1
6	钻孔石刀	良渚文化	长3.1厘米,宽3.8厘米,厚0.4厘米,残	LWLD1④:3

在古沙河的下游,新石器时代文物采集地点有洋渚、东陵、桂林、茶亭、小桥头、鲁里、杨家边、黄家湾、孙家头、姜家边、河南东队、漩水塘等12处,另外古沙河道和沙河水库溢洪道采集的文物有10件。现将溧阳市文管办库藏部分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文物记录如下：

序号	名称	时代	级别	特征	来源
1	石犁	新石器时代		青石质,通长20厘米,刃宽17厘米,厚0.8厘米	1988年2月5日原沙河乡桂林村出土
2	石锄	新石器时代		石质,长6厘米,锄加宽8厘米,把直径1.5厘米	1972年6月7日原茶亭乡黄砂矿出土
3	石钺	新石器时代	二级	石质,长18厘米,钺口宽11.5厘米,柄宽6.5厘米	1987年6月3日原沙河乡古河道出土。
4	有段石铤	新石器时代		石质,长8.5厘米,口宽2厘米,把宽1.5厘米	1981年4月28日原沙河乡东陵村乌龟丘砂矿出土
5	有段石铤	新石器时代		石质,长16.5厘米,口宽3.7厘米,把宽3.5厘米	1981年10月25日原戴北乡孙家头村出土
6	有段石铤	新石器时代		石质,口宽4.5厘米,长14.3厘米	1981年12月31日原戴北乡红武姜家边村沙塘出土
7	陶鬲	新石器时代		陶质,足距长19厘米,通高22厘米 缺一足	1974年8月17日原沙河乡出土
8	带木柄石斧	良渚文化		长11、宽2.5、厚3厘米、木柄长28.7厘米。。这件石斧的柄为横装,使用时用两手把握,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带木柄石斧。现藏于镇江博物馆	1977年8月溧阳沙河新石器遗址出土
9	带木柄有段石斧	良渚文化		石斧长15、宽4.5、厚3厘米,木柄长32、头部最粗径6厘米。现藏于镇江博物馆	1975年7月溧阳沙河新石器遗址出土
10	带柄石铤	良渚文化中期		现藏于溧阳市文管办	1978年8月出土于古沙河道

这些遗址、遗物的发现表明,小梅岭玉石矿所在的古沙河流域上游在良渚文化甚至更早时期,已有人类居住生活;而古沙河的下游地区,新石器文物发现的地点多达13处,有些就直接出土于古沙河道中,说明这一时期古沙河下游两岸人口居住更为密集,古沙河已经成为联通上下游的水路通道;古沙河的中游,因为沙河水库的建成,未能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总之,从地理位置来看,在新石器时代,小梅岭玉石矿所在的古沙河流域已经成为人类聚居的区域,即使是古沙河流域的源头处的宜溧山地平均海拔也只有200—300米。因此,人类发现并开采小梅岭玉石矿是非常容易的。

(二)从石器制作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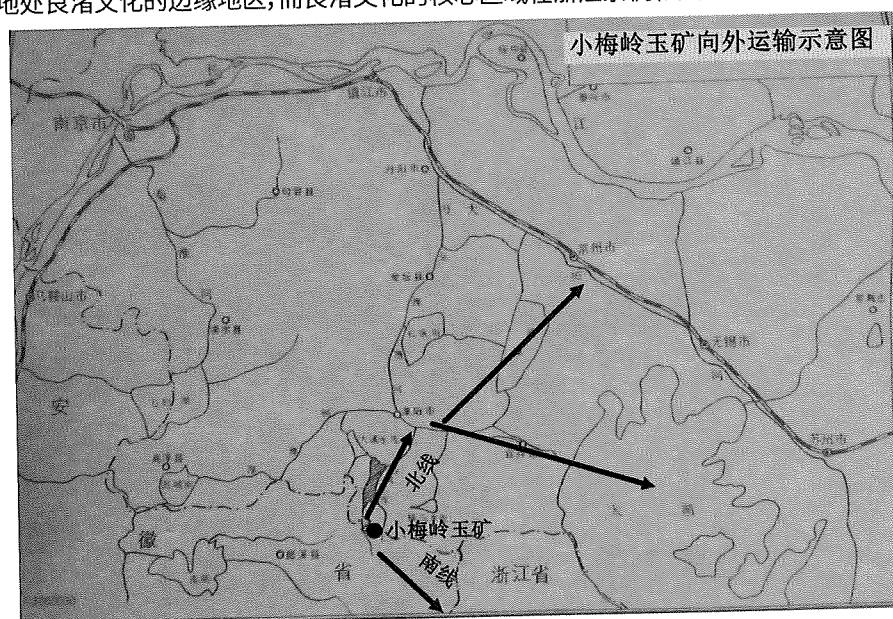
宜溧山地的西侧和西北侧,有马家浜文化的神墩遗址和秦堂山遗址,目前出土了二三十件玉器,其中就有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颜色多为青绿色或青白色,与小梅岭玉石料质地、颜色相符。同时出土多件砺石器,为磨制石器的工具。

序号	名称	时代	特征	考古编号
1	砺石	马家浜文化	砂岩,黄色。残长10.4、残宽6.1、残厚2.8厘米。不规则形,正背面作为研磨面使用。正面中央有一条浅凹槽,石质砂性强。	T0832③:9
2	砺石	马家浜文化	砂岩,褐色。残长8.1、残宽6.2、残厚3.4厘米。不规则形,正背面有打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微凹的磨面,石质砂性强。	T1034④:16
3	砺石	马家浜文化	砂岩,黄褐色。残长8、残宽5.4、残厚2.3厘米。不规则形,正背面有打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微凹的磨面,石质砂性强。	T1034⑤:6

此外,1984年8月25日在小梅岭玉石矿西北约30公里的原汤桥乡采集到一件新石器时代石磨具,现藏于溧阳市文管办。该文物高7厘米,宽9.5厘米,槽口深3厘米,也为磨制玉石器的工具。可见,从石器制作来看,无论是玉器成品还是制造工具,都说明溧阳地区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采石制作玉器,其玉石料来源应为附近小梅岭所在的宜溧山区。

(三)从小梅岭玉石向外运输来看

小梅岭玉石矿地处良渚文化的边缘地区,而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浙江余杭和太湖流域的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人们是



如何将数以吨计的玉石产品进行长途运输的?根据古沙河的出土遗物和地形,笔者试做如下推测:

良渚文化时期,古溧阳人利用古沙河运输采掘后的玉石原料,或者就近加工制作成品后再外运。外运路线可分为两条,北线经由徐家园河或中田舍河到古沙河,再到戴埠河,再经屋屋溪或南河,运输到太湖,进而运输到浙江余杭和太湖流域等良渚文化中心区域;南线经由苏皖山间松岭、李家园等地的古道,再经水阳江或徽杭古道,运输到安徽、浙江等良渚文化中心区域。考虑到水路运输的便利性,北线应该是运输小梅岭玉石矿的主要通道。古沙河经常爆发洪水,运输玉石料有时是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这也许就是古沙河河道和河边砂矿中经常采集到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原因吧。

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使用船只来运输的技术。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和体型硕大的木槽,常州圩墩马家浜遗址也出土了木槽木桨,说明那时江浙地区的居民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良渚文化的兴化县蒋庄遗址曾发现用一整根巨木掏挖成的独木船棺,长度超过2.5米,宽度超过1米。

总之,溧阳古沙河流域,无论从地理位置、从玉石器制作来看,还是从向外的运输途径和技术来看,在新石器时代,尤其是良渚文化时期的溧阳人已经具备了生产、制作、外运小梅岭玉石的可能和技术,这再次印证了小梅岭玉石矿为良渚文化玉料产地一说。

曹昕运,溧阳市文管办党支部书记,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 2、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年报》,2011年1月。
- 3、肖梦龙:《试论石斧石锛的按柄与使用—从溧阳沙河出土的带木柄石斧和石谈起》.《农业考古》1982年02期。
- 4、林留根:《骆驼墩文化初论》.《东南文化》2009年05期。

尹湾汉墓简牍所见丝绸之路史事

朱磊

1993年,东海温泉镇尹湾汉墓出土了一批记录西汉时期东海郡行政文书的竹简和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就是其中记录武器仓库库存的账册,是在一片木牍的两面密集书写230余条,计240种,合计23268487件兵车器装备。在这些分栏登记的条目中,有一些涉及西域的信息十分珍贵,“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便是其中的一条。(图一)



图一 《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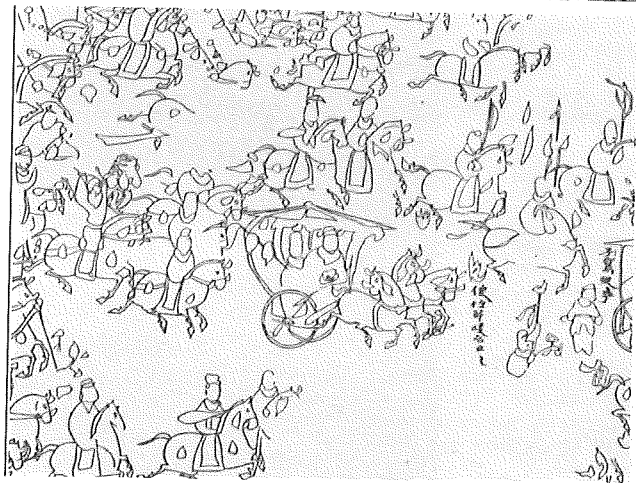
一、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

此乌孙公主就是当年那个叫刘解忧的女孩,她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孙女,作为和亲的后补队员,自武帝太初四

年(前101)离开故土至宣帝甘露三年(前51)回到长安,刘解忧在乌孙国生活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黎虎先生考证)。在这期间她经历了太多挫折与悲欢,首先和亲本身就遭到了部分朝臣的猜疑与反对,说她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汉书·萧望之传》:“前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得立而还,信无负于四夷,此中国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其议,征少主还,后乌孙虽分国两立,以元贵靡为大昆弥,汉遂不复与结婚)。然后,她前后嫁给三任乌孙王,但皆为右夫人,属次位。而左夫人为匈奴人,语言、风俗与乌孙国相通,宫廷中各种权利、争宠的斗争定不会少,娘家尚在万里之遥,而前方汉朝与匈奴的战事多有失利,最要命的是初嫁时久不孕,和亲无血脉之链,饱受冷落。在各种险象环生的逆境中,忍辱负重的刘解忧志向坚定,苦心经营,极力维护汉朝和乌孙的联盟,在捍卫了两国领土完整的同时也塑造了传奇的一生。

今看,乌孙公主的身份不仅是外族首领的妻子,还要担任外交官。通过常驻于和亲国之日常活动,了解和掌握该国的国情和动态,为朝廷决策提供情报和建议十分重要,惜其女儿身,史册将其一笔带过。但是单从“使节九十三”可见,和亲公主与汉朝消息往来是十分频繁的。

在汉代,“使节”也称“汉节”,是政府正式外交信物,也是一种标志,与之配套的还有相关文书。《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汉官仪》:(节)以竹为



图二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壁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出行”之，柄长八尺，以牦牛尾为其毳三重。《汉书·高帝纪》：封皇帝玺符节。颜师古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由此我们可知节为竹制，长八尺（约1.8米），其上按比例束三重用牦牛尾毛制的节旄。1971年，内蒙古和林

格尔汉墓出土壁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出行”以及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皆较好地保留了“汉节”的形象。我们常见的《苏武牧羊图》所绘，如龙头杖状并吊坠一串红色缨球，实为受到了明代“金节”之误读。“汉节”既是有机物，怪不得未见实物出土。《汉书·苏武传》：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图二）

关于“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断句，李均明先生认为此句指的是乌孙公主和有关诸侯出使西域时使用的旗子形凭证；袁延胜先生认为是乌孙公主与诸侯交往的使节九十三，但是也不排除楚王向乌孙公主派遣使节的可能；谢绍鹞先生认为是楚国派往乌孙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复上交的使节，一直在武库中保存；而存放“使节九十三”的武库更多的学者认为是汉朝中央设于东南地区的直管大武库。

二、径路匕首二万四千八百四

“径路匕首二万四千八百四”。也是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记录的一条。径路匕首即轻吕，轻吕是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即月氏人。

《汉书·匈奴传》：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颜师古注：径路即匈奴宝刀也。成语“留犁挠酒”谓汉族王朝与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订立和约。本条记录径路匕首数量达“二万四千八百四”，明显，时已为常规制式武器了。

三、郅支单于兵九

“鄯支单于兵九”。鄯支单于兵是一种匈奴武器，九件。由于未见其貌，不排除是标有鄯支单于徽记的武器。鄯支单于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的北匈奴第一代单于，是个厉害角色。曾击败大宛、乌孙等国，强迫四方各族进贡，威震西域，一度导演了匈奴的短暂复兴，最后被汉朝远征军击灭。兵车器库藏鄯支单于兵，可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四、橐佗龟车五乘

“橐佗龟车五乘”。橐佗即骆驼，橐佗龟车是以骆驼牵引的辘重车，西域国家流行。存於武库之中很可能是匈奴或西域诸国所献，也可能是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

五、薰毒八斗

“薰毒八斗”。根据张显成教授的考证，“毒”是“毒”的省笔字，薰毒即薰毒、薰陆、薰陆香。其主治功用是止痛长肉、调气活血、治跌打损伤，也可作香料。是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的胶树脂。薰毒中土不产，是外来药，多产于红海沿岸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在庞大地武器仓库中仅存“八斗”，说明此药珍贵。

有趣的是同尹湾汉墓发掘的90年代初期，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也出土了写有“薰陆”的早期纸张，该纸张是包裹药品用纸。汉代的悬泉置是建立在河西走廊上的一处供传递邮件、传达命令和接待宾客用的综合机构，与西域诸国、部落交往频繁，远至喀什米尔、咸海、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薰毒”定是通过人扛马拉，一站一站的接力才从遥远的西域输入东海郡一带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录的“薰毒”比后期医药典籍记录提前了

300多年。(图一)

本牒所记的内容，都见证西汉时期，汉朝与西域之间的往来而形成的“丝绸之路”。汉时的东海部，曾是这条丝绸之路的东端。

在古代，国际间并无秩序可言，想要立国，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穿越国际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方在军事、政治上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话语权。可是西域太大了，虽然西汉王朝曾在那里设置都护府，但实在没有办法像内地那样实行层级明显的行政管理，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又分成五六十个大小国，各有联姻，合合分分，汉朝所派官员既要有一定的数量，又要尊重地方习俗和利益分配，仅刘解忧不够、王昭君太少、冯嫫不长三头六臂，汉王朝对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府管理鞭长莫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路是诸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建造的。

今天的“丝绸之路”，不论是陆路还是海上，途经地域仍分布着许多宗教、种族、肤色、语言、历史观各不相同的国家，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也是实现睦邻友好、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最困难点。鉴于往事，稳定和总体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最担心的，是需要极力维护的基础所在。

朱磊，连云港东海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火淬陶土瓷源韵

——淹城出土的原始青瓷鼎

施建刚



1993年4月，常州市淹城村民从名为“屠家墩”的土墩内挖出一些带花纹的陶瓷碎片。这座位于淹城遗址城西古墓葬区内的土墩，距淹城外城河约300米，淹城博物馆随即对土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鼎、碗等原始青瓷器和少量印纹硬陶器。其中的原始青瓷鼎出土时保存完整，为原始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瓷，瓦之坚者也”。夏、商之际，人们已经在臻于成熟的陶器制作基础上，发明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瓷器”。与后代制作成熟的瓷器相比，这一时期的瓷器在胎、釉的烧造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原始性，因此学界统称为“原始瓷”。瓷器诞生之初均为青色，因为瓷釉由石灰石加粘土配

制而成，其中的铁、钛等成分经火淬炼之后，会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青色，为原始瓷器的一大特色，因此也称“原始青瓷”。

淹城屠家墩出土原始青瓷鼎口径17.2、腹径18.8、高12.4厘米。口外侈，束颈，鼓腹弧底，腹下三足粗短，微向外撇。肩部施有陶形横系一对，横系两端饰堆贴的“S”形堆纹一对。腹上部饰两排刻划曲折纹，并堆贴两条竖向扉棱，扉棱的上端亦堆贴“S”形堆纹一对。腹内壁有规则的线纹。器身釉色黄中泛绿，施釉不甚均匀，釉斑大小不一，是春秋时期吴文化特色原始青瓷器。

“原始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其制作、烧造工艺

却并不“原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时期原始瓷的制作工艺已经出现了快轮技术，淹城原始青瓷鼎的内壁上一圈圈平行的线纹，就是快轮成型制作留下的轮纹痕迹。这些螺旋形线纹排列规则，线条流畅，具有天然的美感，因此在胎体制作完成后并不抹平，作为一种特殊的装饰保留下来。快轮技术的普及，不仅大大提高了原始瓷器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制作出的原始青瓷形体规整，厚薄匀称，为原始瓷造型多样化做好技术上的保障。



在烧制工艺方面，以龙窑为代表的窑炉构筑等技术全面提高与成熟，原始瓷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100~1250℃之间，瓷胎的烧结程度更高。以淹城原始青瓷鼎为例，胎色为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敲击有金石之声。且胎、釉结合紧密，基本无脱釉现象，说明当时对窑炉温度的控制已接近后代成熟青瓷烧造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原始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



原始瓷器由于外表施釉，与陶器相比不易沾污渍且便于清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西周后期到战国

时期大量流行，器物类型十分丰富，涵盖了从日常实用器到陪葬用品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以原始瓷路仿造青铜礼器是长江下游地区原始瓷器的一大特色。从尺寸、形态、出土情况等多方面考证，包括淹城原始青瓷鼎在内的原始瓷礼器，显然不具有日常使用价值，应是专门用以陪葬的青铜礼器替代品。



瓷器是水与土的升华，泥与火的艺术。原始瓷作为瓷器始祖，在今天看来或许简朴平淡，但从瓷器发展历史、甚至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来看，原始瓷的诞生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直接催化了后世青瓷的诞生和发展，为制瓷技术的普及、瓷器盛世的出现做好了技术和物质上的准备。

施建刚，武进博物馆馆长。

云鬓轻拢妆高髻

——明代漆纱珠翠庆云冠

芮路俊

1997年5月，常州武进王洛家族墓的发掘将许多珍贵的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打开棺木的一霎那，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那些金光闪闪、璀璨耀眼的头饰，王洛妻盛氏墓出土的漆纱珠翠庆云冠尤为精美，让人不禁感叹明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漆纱珠翠庆云冠由髻髻、挑心、分心、顶簪四部分组成。以覆黑色绉纱的银丝编织髻髻为框架；冠前髻髻佛像金挑心，佛像两侧各立有一童子，下部为莲花形底座；冠后有以弯弧月牙形云龙纹金饰件为分心；冠顶中部有一金顶簪，由十朵金花合抱环围为托座，以十八片葵瓣嵌作的花蕊中间镶嵌有一块绿松石，富丽堂皇。盛氏墓出土的漆纱珠翠庆云冠及冠两侧的花头簪就组成了一副较为完整的“头面”。

明代女子盛装打扮时，用各种首饰装饰，几乎无头发外露。首先在梳好的发髻上覆上一顶小帽将头发罩住，这类小帽称为髻髻。髻髻以银丝编制最为常见，也有讲究的用金丝编制或金片锤鍱。银质髻髻者，多是细丝编作灯笼孔的尖圆顶的网罩，而金质的则多为冠的样子。盛氏的髻髻即为银丝编织长方孔网纹框架，框架上覆以黑色绉纱。银丝细如头发，整冠可谓轻盈精妙。

挑心是明代头面中的重头戏，因它是自下而上用挑的方式簪戴于髻正面的当心，故名“挑心”。盛氏庆云冠挑心以佛像为挑心簪首，金佛像两侧有金质童男童女与之相联，下部为金质荷花底座。这正是挑心最为常见的样式。元伊世珍《辘轳记》卷下引《禅林实语》曰“有女子卸冠者，奉观音大士甚肃，比丘尼往往劝其修净土，云当作观音观，观其法身，愈

大愈妙。自此夜恒梦见之，然甚小，若妇人钗头玉佛状。一日其夫寄一玉观音，类梦中所见，自是奉之益笃。”把佛像作为簪头或钗头的装饰，大约同观音崇拜有关。首饰的设计灵感，或即由此而来，这一类的簪子便多是作为挑心戴在当中，也是有驱魔祈福之意。除佛像之外，挑心的常见装饰还有宝塔、仙人、凤凰等等。

明代女子在髻前后口沿处插戴一种样式奇特的簪，名“分心”。分心又根据佩戴前后位置不同，分为“前分心”和“后分心”两种。在《金瓶梅》第二十回说李瓶儿取出一顶金丝髻髻要吩咐银匠该作一件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并特别说明是要“正面戴”，可见前后造型区别较大。盛氏庆云冠分心应属于后分心，整体为一弯弧形，正面上缘有一尖拱，中心最高。两边从尖拱各低下来，造型像菩萨观或仙冠的当心部分，上饰月牙形金质云龙纹，背面接有扁管作为簪脚。另外，常见分心装饰题材还有西王母、观音等仙佛或牡丹、凤凰等。

顶簪与挑心不同，挑心通常为单独一只，自下而上佩戴于髻髻前面中心位置，而顶簪则是自上而下插立与髻髻顶端，常为单独一只，有时也成对出现。成对者多造型小巧，而单独则华丽。庆云冠顶簪正是单独一支，簪头花饰有三部分组成，下部为10朵金质小花，小花之上有18片金质葵形瓣，在葵形瓣中镶嵌有一颗绿松石，可谓富丽堂皇。

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之风益盛，追求奢巧的风气直接促进了金银制作工艺的进步。王洛家族墓出土的盛氏的漆纱珠翠庆云冠正是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典型之作，它以贵重的金银、宝石作为装饰，采用锤鍱、累丝、镶嵌的方法，使得器物精美灵巧、立体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本文附图见封三）

芮路俊，武进博物馆副馆长。

江苏溧阳城西公社上阁楼大队明墓出土金饰选粹

张 剑

金银发饰是明代妇女服饰中最具时代特征的饰物，其中以髻髻最具典型性，大大小小的簪钗，比较固定的组合关系，成为明代女子妆束的亮丽风景。髻髻是女子戴在发髻上面的发罩，多用银丝、金丝或马尾、篾丝、头发等编成（也有用纸或织物做的），外面通常覆以黑纱，形似圆锥，罩住头顶的发髻。髻髻上插戴各式首饰，称为头面。一套标准的髻髻头面包括戴在正中的分心、戴在底部的钗儿、戴在顶部的挑心、戴在后部的满冠、分心左右的草虫簪、两侧的金花头银脚簪、戴在鬓边的掩鬓等，这些簪子插在髻髻上，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一副头面”指髻髻及插戴在髻髻周围、装饰题材一致的各式簪钗。

1966年4月，江苏镇江博物馆在江苏省溧阳县城西公社上阁楼大队清理明墓一座，出土文物29件，包括四乳四神镜、牡丹花金簪、圆形镂空凤凰牡丹花金帽花等，其中不少文物为金发饰，现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金发饰略作介绍。

蝴蝶牡丹花金簪，金质、圆形、内空，三层阶梯式造型。高浮雕工艺制成，底部刻花瓣纹一周。饰物正前方刻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昂首仰望上前方的牡丹花丛，后部为草叶纹，左右两侧呈阶梯形，顶端为一朵含苞待放的大牡丹花。整件饰物造型层次分明，花瓣、叶茎纹路清晰，花瓣层层堆叠，工艺十分精湛。冠顶部大朵的金质牡丹花被卷曲的叶茎烘托，花侧蝴蝶翩飞，“牡丹绽放蝴蝶来”的纯美瞬间被定格，丰盛饱满的“蝶恋花”主题把牡丹花的优雅华美与黄金的尊贵气派完美结合，寓意“大富大贵，康宁长寿”，是整套头面中最为醒目的一件。饰物内部有簪座痕迹，此物应为“挑心（顶簪）”（簪梗佚）。高4.1，径5.4厘米。

金牡丹花簪，金质。同出土8只，形制纹饰相同。簪首均錾刻一朵绽放的牡丹花，圆梗体，向尾逐步收细。花簪两两成对，插戴于髻髻冠体两侧，起到将髻髻固定在发髻上的效

果，在髻髻头面里属于花头簪。通长11-13厘米。

金蝶花形簪，金质。同出土2只，形制纹饰相同。簪首为四朵金花和一只金蝴蝶组成的蝶恋花图式，金蝴蝶背部镶嵌一颗红宝石，圆梗体，尾部收细。可称为鬓钗或者掩鬓，在髻髻头面里被插戴在发髻后面。金银和珠宝玉石的结合，重要的是烘托和映带，层叠镶嵌的工艺营造出花团锦簇、和谐生动的效果。长13.5厘米。

金圆发簪，金质。同出土2件，形制相同。簪首为实心半球形，圆梗体，向尾逐步收细。金圆发簪，明代多称为“金裹头”，可以插戴在狄髻上，或者盘发髻时，用来固定发髻。通长10.2厘米。

圆形镂空凤凰牡丹花金帽花，金质。同出土十二只，形制相同。花形缘，正面略凸，中部堆雕盛开牡丹，对凤环绕周围。这里的帽花并不是我们今天常戴的那种包住整个头部的帽子上的花，而是“额帕”的装饰之花。额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唐朝时叫抹额，宋朝叫抹子，清朝时候又叫勒子、乌兜，讲的都是它，这是一种既有装饰作用、又起到保健功效的饰品。在额帕上面装饰大量的帽花、金银珠玉、镶嵌宝石，工艺复杂、华美异常，名副其实的“低调奢华”。径3.4厘米。

明朝是把发饰的奢靡细腻、精美繁复发展到极致的一个时代，江苏溧阳城西公社上阁楼大队明墓文物，虽未见髻髻（可能因为随葬，不是金银质地，已腐朽），但戴在髻髻之上的挑心（顶簪）、花头簪、掩鬓、金裹头、金帽花等，一应俱全，纹样上，各类簪和挑心（顶簪）亦相呼应，牡丹花、蝴蝶的元素随处可见，定义了“蝶恋花”的头面题材，约略寻得明代发饰的装饰趣味，引来无限遐想……（本文附图见封三）

张剑，镇江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康熙临董其昌书《龙虎台赋》御碑

罗志

康熙皇帝对于汉文化的热爱，带着清代统治者汉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康熙皇帝不仅在理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书法，也堪称清代皇帝中的翘楚。在淮安大运河旁，就留有康熙帝临米芾《清秋赋》、临董其昌《龙虎台赋》等多方书法御碑。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晚明时期著名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万历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董其昌的书法、绘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康熙皇帝在书法上是董其昌的“粉丝”，他和他的孙子乾隆皇帝，都以董其昌的书法为宗，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皇帝还为董其昌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

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由于康熙皇帝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在清代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当时追逐功名的举人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足可见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康熙皇帝南巡经过淮安，阅览河工漕政之余，将临摹的董其昌《龙虎台赋》书法赐予臣工。淮安地方官自然不敢怠慢，勒石上书，立于淮安府城西大运河岸边的淮阴驿皇华亭。皇华亭，又叫御诗亭，是康熙皇帝南巡下船、登岸、进城的地方，在这里镌刻康熙皇帝御碑，其用意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龙虎台赋》也是文学名篇。明初著名文臣刘基(刘伯温)游历北京城西北群山中的龙虎台，为之作赋，描摹燕山壮丽景象，歌颂皇恩浩荡，写得文采斐然，气魄非凡。现将此文录下：

龙虎台去京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蹕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

猗欤太行之山，呀云豁雾，结元气而左蟠。于赫龙虎之台，摩干轧坤，魁群山而独尊。其背崔嵬突撑，森冈峦而拱卫。其势则昆仑，仰星辰之可扪。白虎敦圉而踞峙，苍龙蜿蜒而屈盘。状昂首以奋角，恍飙兴而云屯。其北望则居庸嵯峨，烟光翠结，攒峰列戟，断崖立铁。跋乌飞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视则涨海冲融，飞波洗空。风

帆浪舶，往来莫穷。想瀛州之密迹，睇三山之可通。彼呼雁戏马，适足彰其陋；而眺蟾望屋，曷足逞其雄！岂若兹台之不事乎版筑，而靡劳乎土功也。

想其嵌岑崎嶇，曼衍迄峙，形高势平，背山面水。巨灵献其幽秘，归邪护其光晷。何嵩华之足吞，岂岱宗之可拟。此所以通光道于上都，揭神京之外垒。匪松乔之敢登，羌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黄既驾，鹵簿既齐。方玉车之万乘，蔚翠华之萋萋。载云罕与九游，光彩绚乎虹霓。山祇执警以广道，屏号洒雨以清埃。朝发轫于清都，夕驻蹕于斯台。明四目以遐览，沛仁泽于九垓。眇轩辕之梁甫，屑神禹之会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数乎方壶与蓬莱！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虽未获睹斯台之壮观，敢不慕乎颂声！遂作颂曰：

杰彼神台，在京之郊。金城内阻，灵关外包。上倚天倪，下镇地轴。太行为臂，沧海为腹。崇台峨峨，虎以踞之。群山巃从，龙以翼之。于铄帝德，与台无穷。于隆神台，与天斯同。崇台有伟，鸾驾爰止。天子万年，以介遐祉。

现在这块康熙皇帝临董其昌书《龙虎台赋》御碑仅剩两块残碑，文字也剥蚀严重。此外，据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漕运总督桑额立此碑之时，其旁还有康熙皇帝临米芾《清秋赋》碑和康熙手书《激引清风》御碑。现《激引清风》御碑已荡然无存，临董其昌书《龙虎台赋》御碑仅剩两方残碑，唯有康熙皇帝临米芾《清秋赋》碑，现藏于淮安府衙。运柳萧萧，残碑难寻，唯留怅然而已！

罗志，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武进地方名刻

——《咏如刘先生风雪长征图》简介

张军



近日，笔者与常州地方文史爱好者冯国平一起，在宜兴民间发现一块与晚清武进名人有关的石刻，叫《咏如刘先生风雪长征图》，该石刻具有一定的纪念、收藏与文物价值。这块石刻为青石质，虽然距今已有百余年，但保存尚属完好。碑石为长方体，长1米，宽0.45米，厚0.12米，现收藏于宜兴“天人陶舍主人”史顺强家中。据了解，目前已有固定人群在收藏石刻，其中带有纪年、人物、动物等造型的石刻尤受藏家青睐，不少人将之珍藏于室内作为文房陈设，本地资深收藏界人士朱炳国表示：这些古代石刻，由于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变得火气全无，放书房里供人观赏，能使人心的心静下来。所以目前在市场上，这种石刻的价位起码在一万元以上。

据史顺强介绍，这块石刻是宜兴一位做古玩生意的朋友，前些年从常州城某老宅拆迁时淘来的。史顺强看到碑上

的雕刻非常漂亮，于是就收了下來。

这块石刻左下方刻有刀枪等多种兵器，还刻有军旗，左上方是雪景中的山与城墙，城墙的墙体、垛口等设施刻绘得十分精细，石刻正中偏右方，中军帐内，主人公刘咏如坐在靠背凳上，左手按在书桌上。他国字脸，额头皱纹已深，眼袋较深，一字须，头戴官帽，帽后为花翎，身披斗篷，斗篷下是官袍，两只袖口上的动物皮毛毫厘毕现，足穿双履，腰缠玉带。书桌周身饰有圆形花纹，书桌上放置一座烛台，上面插有一支蜡烛，烛台边放置有一堆线装书以及一方砚台、一支毛笔。中军帐外右侧，有一棵枝干遒劲的老树，老树的主干越过中军帐，在中军帐上方露了出来。因为描绘的是雪景，这棵老树只有枝干而无树叶，老树右侧是山石，山石上长着草莽荆榛。

史顺强认为老树、山石，都意味着这位刘咏如先生虽然年老，但仍然忠于职守，固守中军帐，勤于军务，闲时不忘认真读书。这块石刻正是反映了刘咏如的军旅生活，但细节已无法考证。

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宜兴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的储云看过这块石刻后，赞叹为难得的精品，其书画、题款、雕刻为“三绝”，并为该石刻敬题《木兰辞》中的诗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以表达对这块石刻的敬重之意。

三位名人联手创作

经过研究，史顺强发现这块碑中有两位是武进人，其中一位是画中人，叫刘咏如，是武进人；另一位是画者黄山寿，是晚清著名画家。

从碑上可以看出，这张画是由黄山寿画，王文韶题词，并由无锡籍刻工吴荣雕刻。仔细观察这块石刻，可以看到其雕刻工艺主要为游丝线刻与阴刻，雕刻的力度刚柔相济，有线条，有留白，包括画中的虚实关系处理得很独到。山水、衣纹，没有一点瑕疵，题款上还有隶书、魏碑、行书等多种字体，这需要雕刻者有精湛纯熟的技艺，才能顺利地完成雕刻工作。

黄山寿(1855—1919)，江苏武进人，官至直隶同知。他幼年贫困，专志于书画，五十岁后在上海卖画为生。黄山寿的精品佳作，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无论是水墨或设色，无不清雅绝伦。他的水墨山水、人物、花竹、墨龙、墨虎，无不洁净含蓄，墨色焕发；他的设色作品，艳而不俗，丽而不挑，用色特异，产生一种独特的清鲜亮眼气息，是改琦、任熊之后，又一用色用墨的能手，可与吴穀祥鼎足而四，为晚清四大设色墨彩名家。

王文韶(1830—1908)清末大臣、藏书家。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他在当时十分有名，并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兴办学校等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奏设北洋大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等、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上海南洋大学，为国家造就一批人才。在杭州清吟巷的家中耗巨资兴建规模宏大住宅，院内设有“退圃园”、“红蝠山房”等休闲寓所，建有藏书阁“清吟阁”，收藏各类图书万余册，楼址至今仍存。有

《王文韶日记》。

吴荣，是晚清时期江南著名的石刻工匠，无锡人，当时不少达官贵人请他刻碑，但是留下来的史料很少，至今留存下来的作品是其为江阴的《重建戚公祠并修墓碑记》所刻刻石的拓片。

画中人是曾国藩下属 为武进西营刘氏后人

刘咏如是谁？笔者从常州图书馆及常州家谱馆提供的1929年版《刘氏家谱》，以及民国版《武进西营刘氏清芳录第一集》获悉，刘咏如就是刘曾撰。刘曾撰(1827—1891)号咏如，字芙孙，晚号咏零老人。清阳湖人，诸生。官湖南候补县丞，因军功历保知府，加道衔，简放辰州府知府。《武进西营刘氏清芳录第一集》中《皇考咏零府君家传》记载，刘曾撰为武进西营刘氏第十七世，其五世祖为刘于义，祖父为清朝翰林、政治人物、学者刘嗣綰，父亲为刘延和。他的传记就是由晚清著名人物翁同龢撰写的。

另据《曾国藩全集》，晚清大名人、湘军统帅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给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中有“八月一日刘曾撰来营，接尔第二号信，并薛晓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为慰”等句。此外，安庆内军械所由曾国藩创办，而刘曾撰为安庆军械所首任委员，可见其当年深得曾国藩信任。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记载：“咏如来，华若汀来。夜同霍生到咏如处，与偃老、丹臣谭话，并识喻庆勋总戎吉三。”而赵烈文正是曾国藩的首席幕僚，与刘曾撰同为武进老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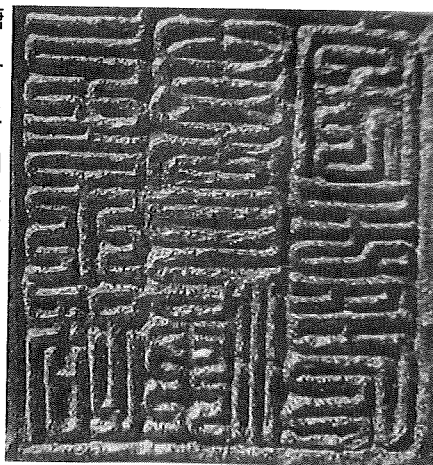
常州图书馆古籍部专家朱隽认为，这块石刻，反映的可能就是刘曾撰在曾国藩手底下，兢兢业业地忙于军务的珍贵画面。

张军，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武进地方文联研究会会员。

由金国金印追溯湖塘镇抗元斗争史迹

夏星南

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收藏一方金国军职铜官印，系1985年文物普查时在湖塘镇发现征集。此印为正方形，印边长6.5厘米、厚1.5厘米、钮高2.5厘米，钮顶端有一“上”字；印面阳刻九叠篆书“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九字；印背面左侧阴刻“贞祐二年四月 日行部口”，右侧阴刻“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又在印左侧阴刻“贞祐二年四月 日造”。查《金史》，上京路路治，即是金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全辖区范围相当于今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东侧一带。金国是以“路”来划分行政区域的，万户是金国所设置的官职，为世袭军职，统领千户、谋克，隶属于都统。《金史·兵志》记载：“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名也。”说明军职名称、编制、隶属关系在金国建立政权初期就确定的。此印称“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只属于中下级军衔编制。



查历代历史年表显示，贞祐年号是金宣宗完颜珣年号，贞祐二年是公元1214年，到金国灭亡仅剩20年时间，此时金国国力日渐衰落，已无力对外扩张，只能保境安民，苟延残喘。可是此时此刻，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族兴起，太祖铁木真（1206—1227年）统一蒙古各部落，势力日益强大，并向东边金国侵犯捣扰，最终于蒙古族第三代太宗窝阔台于公元1234年征服金国全境，金国统治者投降归顺，部队收编，保留部队体制番号及世袭，但统一由蒙古（后改国号为元）管辖领导。

这里提出一个历史问题，金国“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为何遗落在武进湖塘镇？笔者认为这与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问鼎中原、南侵南宋政权有关，金国被收编的部队随同蒙古铁骑入关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了常州遇到了麻烦，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元军直逼常州城下，常州知州赵汝鉴弃城而逃，安抚戴之泰开城投降，元军不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常州，元军中被收编的原金国“上京路万户洪字号”部也在其内。但不久，常州府在义士姚嵩、陈昭等人的筹划下，在城内外招募两万义军，又与江阴宋军联络，夜袭常州，一举收复，把元军赶出城外，并乘胜追击，元军狼狈而逃，死伤溃退中，这支原金国上京路万户洪字号残部将这颗军印遗落在湖塘镇。

元丞相伯颜得知常州城得而复失，又派遣元军围攻常州城，却遭到常州军民的顽强抵抗，激战四个月，元军久攻不下。元丞相伯颜又调20万元军，并亲临常州指挥攻城，驻守在苏州的文天祥闻讯后，立刻派尹玉、麻士龙两将军领兵赶赴常州支援。走到虞城、五牧时被元军阻击，尹玉、麻士龙面对数倍元军展开生死激战，最终寡不敌众，数千将士全部殉难，史称“五牧之役”。这时常州成了一座孤城，在姚嵩、陈昭等将领指挥下，仍旧死守常州顽强抵抗，又坚持了二个月才被元军攻破，这是常州军民坚守达半年之久的保卫战，元丞相伯颜叹呼曰：“常州是纸城铁人！”破城后，元军屠城，仅剩下18户。后人为纪念这场悲壮的常州保卫战，把十八户居住地改名为“古村”，沿用至今。

夏星南，原武进博物馆副馆长。

晨钟暮鼓话直街

——北大街前世今生

徐伯元

常州有多条被冠名直街的道路,如东面通吴门的东直街,南面广化门的南直街(又称小南门直街)、西面朝京门外的西直街,北面青山门的北直街(又称鼎新坊),另有旧时武进县治前的县直街、府城隍庙前的庙直街。这里要介绍的则是旧时常州府治前的府直街及其往事。

府直街位于常州老城区北部偏西的常州府治前,故而又称府前街。府直街南北走向,南自甘棠桥始,北至府桥,全长约525米左右。民国以前,街道地表铺设石板路面。街的东西两侧有多条里弄小道与之交叉相接。东侧自南而北有临川里(今改称官保巷)、县巷、善庆里、乌龙庵、沙家弄、府东巷、东横街(又称府横街);西侧自南而北有大庙弄、小庙弄、玉佩弄、流霞观弄、玉隆观弄、鸣珂巷、西横街(又称府前街)等,使府直街成为四通八达的通衢要道。

府直街在北宋时曾被称为“世贤坊”,据《武进阳湖合志》载:“宋代郡守赵善防以张政守所居里竖‘世贤坊’,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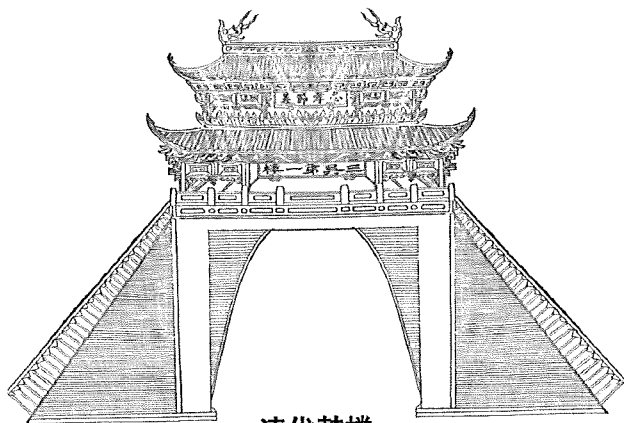
府直街最南端的甘棠桥(位于今新世纪商厦A座西侧,上世纪七十年代筑防空洞时,城河掩埋后拆除)旧称金斗桥,此桥于五代时期地处吴顺义元年(921)所筑外子城的金斗门(南门)之外,故谓之金斗桥。直到宋绍兴元年(1131),郡守俞侯修缮子城时,百姓思其惠,故而更改为甘棠桥。

甘棠桥之北建有“中吴要辅”石碑坊。“中吴”者,因常州居苏州、湖州之中,故而称之。^①

石碑坊之北有大观楼(外子城南门之城墙上)。大观楼原来建于府桥北堍,属内子城州治之门楼,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周瑜之帅台。其楼上上方匾额书“常州”二字,则为南

唐散骑常侍徐弦所篆书,人赞其“笔势雄伟,如金钟覆群龙”之势。

大观楼屡建屡毁,南宋乾道初年(1165),郡守叶衡才迁建于外子城金斗门城上,改称其为“净远楼”。嘉定年间(1200—1234),郡守申弥金将其更名为“高爽楼”。淳祐八年(1248),郡守李迪为敬仰宋代常邑先贤邹浩之意,曾把楼名改称为“景邹楼”。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子城被拆除,大楼被改建为三层鼓楼,楼名额书“三吴第一楼”。此楼下为环门,上构歇山重楼重檐,三门三峡,用以扶栏,高深壮丽。置更鼓刻漏于上,据一郡之形胜。明弘治年间(1488—1505)学士吴宽(明成化八年状元)撰文曰:“江浙之间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据城之中,伟然而壮者,为郡治。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为谯楼,楼之建既久而毁,宣德末重建,郡守桂林莫侯,历六十年于此,风雨震凌,朽烂剥落,前人之功



清代鼓楼

日就废坏。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狱有声，朝廷推择而来，廉明有为，庶事毕举……”

明清时期，府直街为常州外子城内重要街道，又是人文荟萃之地，由甘棠桥至三牌楼，从南向北除“中吴要辅”牌坊外，尚竖有“庚子”、“宗贤”、“靖科”、“嘉同”、“太壁”、“进士”、“柱史”、“巳丑”、“宫詹”、“探花”、“解元”、“庚戌”等石牌坊12座，一路排列，成为常郡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而高耸壮观的鼓楼，成为郡城显著的地标。鼓楼有其光彩一面，亦有使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甚至感到恐怖之处，鼓楼下曾经有过类似旧时北京“菜市口”的情景，作为死刑囚犯被执行斩首的行刑场所。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破南京，明弘光王朝覆灭。六月，清政府通令南方军民一律削发(即剃头)，以表示归顺清廷，不从者军法处置。常州知府曾命邑人管绍宁带头削发。

管绍宁(?—1645)何许人也?他是清乾隆晚年清廷漕运总督管干贞的六世先祖。管绍宁系明崇祯元年(1628)殿试探花，曾授职翰林院编修，不久升任少詹事，随后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执掌江南地区这座最高学府的教务。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后，在南京的福王登基，称弘光帝，管绍宁被任为礼部左侍郎，当时所有福王登基的礼仪均由他筹谋。他以直言切谦著称而遭奸臣忌恨，与礼部尚书钱谦益意见不一矛盾尖锐，怒而辞官回乡退养。知府宗灏知道他拥有明朝探花和高官的双重身份，所以命其带头剃发。他严辞拒绝道：“国家已亡，当臣子的本应赴死!”结果被关进狱中。于是，成为亡国之臣阶下囚之臣的他，置酒慷慨言道：“从今后获死所矣!”为保晚节，随即殉节，自缢身亡。知府恼羞成怒，于六月十六日(阴历)将他的三个儿子(铉、键、铿)及全家老小，甚至连仆人都腰斩于甘棠桥畔的鼓楼下，仅幼孙(滋琪)逃到乳母家，清兵随即追至，强逼乳母丈夫童明高交人，童明高见管家因忠烈而将惨遭灭门，咬牙忍痛将自己的儿子与管家幼孙调换，方保住管家一丝血脉。从此，在清朝期间，郡城中凡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都在鼓楼下被斩首处决，也留下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

辛亥革命后，常州光复。民国十六年(1927)府直街改

造，鼓楼被拆，街道扩建改称北大街。民国十七年(1928)，在鼓楼旧址上构建高达30米的钟楼。钟楼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其钢筋基础深达地下3米多，地表上由四根钢筋水泥柱支撑。钟楼共五层，底层为跨街通道，顶层设瞭望台及自来水水箱，其下装置机械自鸣钟构件，南北两面各安装直径



1964年的钟楼

达2米的圆形钟面，钟上有“余昌钟表号”的招牌，故名“钟楼”。行人每当靠近或路过钟楼时，都要仰望，在那城市建筑物普遍低矮的年代，高耸的钟楼，可谓鹤立鸡群。据说站在南郊距城八里余的陈渡桥(石拱高桥)上，都能看到它耸立的身形，视力好的人甚至能看到钟面的指针。钟楼也渐次成为常州闻名的地标建筑物。

民国时期及解放初，钟楼下附近商铺林立，周围聚集有世界书局、国民书局、日新书庄、文化书庄、篷记笺扇、晓春笺扇、艺新斋笺扇、国际照相馆、邮票公司、人民饭店等数十家文化、商业单位，又有《武进新闻》《武进日报》《武进晨报》《民声日报》等多家媒体驻于附近，成为城中闹市，尤以书店著称。当时，“钟楼下”，已成为了常州闹市区的代名词。

上世纪五十年代常州市的西区因有钟楼而改名为钟楼下。六十年代后期，因城市交通发展，耸立于常州城中心的历史性建筑“钟楼”被拆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革，城市规划更加合理化，北大街已成为常州市区举足轻重的文化、金融、商业活动街区。

徐伯元，原常州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副研究员。

注：①宋祝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指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

<编者按>

2017年是李公朴115周年寿诞，为纪念这位武进籍民主斗士，特刊发两老（山川、冯士彦）一少（汤语琳）的文章，以飨读者。

为了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主斗士李公朴

山川



李公朴是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伟大的民主战士，一生为民主不懈奋斗。

李公朴早期就展示出民主思想。李公朴为了民主，17岁时在镇江学徒因揭露老板囤积日货被解雇；21岁时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

潮被开除；23岁时五卅运动中因积极参加罢课游行以庐江大学上海学联身份任工人科长，回家乡湖塘镇任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五卅后援会”临时主席；24岁时离开庐江大学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为了追求民主、研究民主，26岁时李公朴赴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攻读政治系，并留心观察美国人民对选举总统的态度，三年毕业后有意取道欧洲回国，借以考察欧洲各国民主生活，并在日内瓦参加各国人民促进国际和平团体联合大会。1932年年底，李公朴创办《业余周刊》时强调，店员、学徒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中坚分子，只有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同年他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

时指出，要想改造中国，必须唤醒民众，与他们交往接触，以便更好地认识他们，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凝聚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一致抵御外侮，保障国家的生存独立。中国真正的病根在于“维系民族意识性的各种制度的破产”以及“维系民族独立性的文化日趋消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桎梏，内复遭受军阀官僚的蹂躏。”“只要全国同胞发觉危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感受切肤之痛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要外与帝国主义内与军阀官僚拼命的人增加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民族解放的日子就快到了。”1934年3月，李公朴认为上海市政董选举和华人纳税会市民组选的代表选举这两件事“事关市政进步以及培养民权初步的基本问题”，“欲求政治上轨道，必需人民真正能够监督政治、参加政治；欲求人民参政之能彻底实现，必须能上下一心地积极提倡培养与实施民权初步的工作。”“由此而推及我国各省内地的民治思想。”正确的态度是切实注意选举，并将自己要求民治的呼声以及实践成绩从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推进民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是代议制，代议制又以选举制度来表现。李公朴进一步指出，鼓舞市民对于市政之兴趣，积极参加选举，从而更能够注意到全国政治，为民主政治之前途减少障碍；而且要从实际上探讨逐渐施行的办法。首先，“使人民周知选举之举行；使人民了解选举之意义；诱致人民之政治兴趣，因而看重选举，注意人选。”其次，要“公开竞选”，“应当仿效欧美惯例，采取‘选民提出候选人’制度，并积极鼓励



‘候选人做公开宣传’。”再次，“乡镇选举尤应注意”，因为“乡镇自治与人民之关系既极密切，选民对于入选也自无随便投票之理。”最后，“选举准备时间宜长”，在他看来，“地方自治是实现民治之基础，地方自治不能彻底实现，根本是不能谈到宪政的。”他认为有选举胜于无选举，不健全的自治总比没有自治要好得多。人们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治以及实现自治的方法，而不是要不要自治的问题。

李公朴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着明确的方向性，即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关注基层民主，并以此思想为指引，积极争取民主权利。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中，他主张民主抗日，主张建立广泛而彻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联系各党各派各民族乃至全国人民共同抗日。为此，他去延安拜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深入到延安各地考察。为此，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权。为此，他到处作演讲写文章，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民主的思想和做法。他说，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战，非民主不足以言团结，而民主是问题的中心。”

抗战胜利后，为能在中国真正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到处奔走疾呼，唤起民众觉悟，反对专制独裁，以至在重庆“校场口广场”，发生了特务冲击“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并殴打大会主席李公朴的严重事件。他伤痕累累仍大义凛然：“打死我中国还是要闹民主的！”对前来医院探望的周恩来表示：“为了和平民主和自由，受点伤算不了什么！”“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的前途，死何

足惜！”并发出誓言：“一定要为民主、和平，为老百姓的事业干到底，干到死！”

李公朴与诸多同仁创办民主的“社会大学”，自兼“社大”的教务长。他说：“要使人人都知道民主是什么？怎样实行民主？世界大势怎样？”“社会大学”教育方法的核心是自觉、民主和实践。在李公朴眼里，关键是要在中国进行民主教育，“要在新的宪法里确定民主教育的原则”；“教育应该是植基于民主政治，教育目的是教导民众实行民主，教导民众使用民权。……一定要给教育以一个民主自由的光明前途。”

李公朴全方位地论述民主，推进民主，为民主百折不挠地努力奋斗。

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们从出生以来一直到现在，在家庭也好，在学校也好，在社会中也好，无论是所受的教育以及所过的生活，都不是民主的。我们都不自觉地一方面压迫着人，一方面又被人压迫。”而现在连开会都“没有一点民主的气味。”“政治向更不民主的方向走，致使人民遭受更多不必要的损失。”他强调：“战后的世界已走上民主的道路，中国就不能单独遗落在后边。”“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腐败、贪污、专横、强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民主。”

他把推进民主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在危险日益迫近的日子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视死如归：“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终于，在1946年7月11日晚，他与张曼筠女士在昆明北门街遭到了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次日凌晨，他喊着：“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于“五点多钟，天快亮了”的时候，离开了人间。

像李公朴一样，为探索民主，追求民主，实现民主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古今中外，不可胜数。为什么？因为，自由、平等、民主，是人类精神层面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文明的最高诉求。

山川，湟里高中退休教师，副高职称。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李公朴的先见之明

——读李公朴的《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冯士彦

《李公朴文集》得以重印、传播，保存和充实现代民主思想教育精华史料，功德无量。我很珍爱这套书。

李公朴之所以遭到反动派暗杀，是因为他接受中共领导，代表民族根本利益和进步力量，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先锋战士。反动派最害怕、最痛恨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945年9月2日，西南联大新诗社举行诗歌朗诵晚会。李公朴应邀参加，借“诗”言志，展望其先见预判，即席朗诵《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见《李公朴文集》942页）

读之再三，我钦佩他的大无畏精神与先见之明。

举国正沉浸在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的狂欢之中。狂欢时，大多数人无暇关注、无可发现和防范狂欢背后悄然弥漫、逼近的危机。无边的喜悦，强烈的骄傲。理所当然，无可厚非！李公朴却大声疾呼，发出强音中的强音：“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人们收拾起抛向空中的帽子和鲜花，侧耳倾听这醒耳

的呼喊：

“不要狂欢，且慢骄傲，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它还要靠咱们大家努力，抓紧时机共同创造。”

“不要”与“且慢”，是否定和阻止，警戒和提醒。“狂欢”不可失度，“骄傲”必须慢行。因为，我们渴求和争取已久的“胜利、团结与民主”属于中国的稀缺元素，眼看快要到手，但“并没有真正得到”，还存在着一定距离。这是不可忽视的严酷现实。

李公朴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劝说人们且莫陶醉或麻醉了自我，要靠“大家努力”，“共同创造”，这是历史紧迫的使命。必须“抓紧时机”！

因为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的突然降临，原以为万劫不复灾难的一旦解除，不少国民会因此冲动和眩晕，即被“胜利冲昏头脑”。

沉湎欢乐，糊里糊涂，昏聩起来。这种不清醒状态，其实是政治短视，自欺自慰的表现。

李公朴猛然一声吼，希望人们恢复冷静，理智，明晰事理，认清鼓乐喧天、爆竹硝烟背后的严峻形势。

这首诗，反映了战略家敏锐的眼光，体现了李公朴对历史前途的先见之明。

“胜利、团结与民主”，人民既然尚未“真正得到”，那它仍只是想象的诉求中的合理之物，合情之画，也就是理想的蓝图、模型。

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也曾迷惑和错乱了世代人渴望的心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极其熟悉



纪念李公朴一百周年诞辰

冯士彦

李公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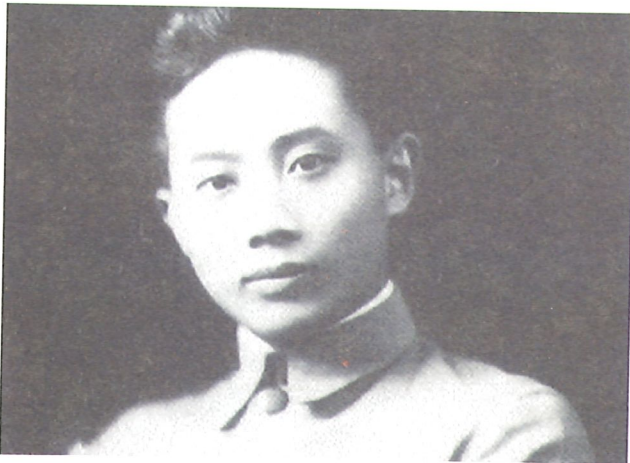
李公朴著 冯士彦编

■

这种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暗示。

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

这里的“时机”,是民族危亡的转机,生死存亡,残酷博弈,悬于一线的瞬间和节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稍纵即逝的机遇、时不我待的起点。这时机,牵动民族的命运,影响国家的基石。分秒松弛,丝毫疏忽,没有抓住、抓紧,可能意味着美好的一切就此毁灭。



“抓紧时机”,这个祈愿的表达,非常通俗,极其深刻。抒发的是常情常理,而又超越了群众普遍的认识,达到了先见之明的超常智慧,高度觉悟。

李公朴接着剖析,人们继续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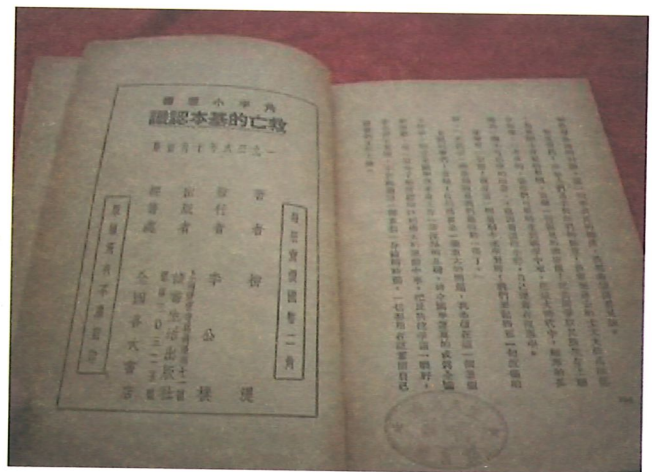
“八年来团结成了空口号,中国的命运几乎不能保。现在‘胜利’总算被‘等’到,这八年的日子真难熬。胜利的果实不能白白地送掉,全国人民必须团结牢。大家一齐来动手,剥掉假民主的外套……”

“团结”不离口,喊得震天响。摩擦和分裂,天天不断头,这是抗战八年中,国、共“友军”之间的常态。因此,“团结”成了空口号。也因此而生出“摩擦专家”这一历史名词。“中国的命运”保存下来,完全是侥幸!

惨烈牺牲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总算“等”到了现在的“胜利”。“等”和“胜利”加上了引号,不用“夺取”和“战胜”,突出“不作为、不抵抗”和“胜利”的侥幸性。

但“胜利的果实”毕竟是实在的,令人喜悦的,属于人民,“不能白白地送掉”。即不能让峨嵋山“等”来“胜利”下山“摘桃”的人,白白地拿去。李公朴的先见之明,或与中共当时的预测,不谋而合。

杀手过早剥夺了李公朴的生命,使他来不及对抗日战绩的估价进行求实的精确清算。这怪不得李公朴,应由暗杀者承担罪责。



第三诗节:

“今天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却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团结的障碍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

李公朴进一步解释,请大家别误会认为他不可一世狂妄反潮流,要掩口噤声阻挡“为胜利、团结与民主”高声歌唱,扑灭大家纵情狂欢的热情。不,他不是独裁者,他绝不反对民众忘情庆祝胜利。他仅仅是要防范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播洒的是空气清新剂,不是蒙汗药和迷魂汤。

李公朴说得多么好啊!

“团结的障碍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

时至今日，这金玉良言，依然是真理。难道不是吗？当下，克服“障碍”（很多），避让“暗礁”（不少），仍然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容轻视的要害与关键。

最后诗节：

“我们要抓紧时机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高唱入云霄。把反民主的军阀、老爷、汉奸、走狗、摩擦专家、顽固分子，一齐都打倒！打倒！！真打倒！！！”

卒章归纳主题。不仅是“把民主、和平”高唱入云，又特别强调要“把反民主的”家伙（包括军阀、老爷、汉奸、走狗、摩擦专家、顽固分子……）“一齐”打倒。

民主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打倒一切反动派。民主的敌人如此之多，是不容易打倒和消灭的。瞒天过海、假公济私、欺诈盛行的烟瘴社会环境，是容不得真知灼见存在、传播的。递进的一、二、三个“！”号，和第三个“打倒”前加一“真”字，一字千钧，非常切实地体现了李公朴的“先见之明”。为这一个比重超过黄金的“真”字，值得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专著。求真务实的民意表达，从来宝贵而难能寻觅。

密切关系国运民命的“民主”道路，勘测、奠基到开辟、建成，空前艰难。其艰难程度，竟然是世纪性的！

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打定主意”。

实现民主，乃建立新中国之根本，战斗正未有穷期。

一首短诗，第二次出现“抓紧时机”，涉及“中国的命运”，从认知到行动，体现关键性、紧迫性，不可游移和动摇的钢铁般的坚定性。

“打定主意”，坚定信心，通过“打倒！打倒！！”直到把民主的敌人彻底地“真打倒！！！”正如解放初到处咏唱的一首雄壮、嘹亮的歌曲所说：“让那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为这殊死的战斗，李公朴付出了他的生命。朗诵完《不要教胜利冲

昏头脑》，向反动派公开宣战，反动派毫不迟疑，暗中向他举起了屠刀。仅隔10个月，李公朴洒尽热血，呼喊“民主”以歿。

李公朴的先见之明，从何而来？

从他写的《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李公朴文集》907页），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他以生于空前的大时代而深感幸福，认识“人生就是战斗”，视死如归，追求正确的方向，密切联系生活思考，关注社会矛盾，对新世界、新时代充满向往和憧憬，不断自我批评、锻炼自己，终于磨炼出新战士的胸襟和眼光。概括地说，李公朴的先见之明，更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经受挫折、失败而从无以计数怵目惊心的“后见之明”中琢磨出来的。月晕础润，见微知著，一定是由后见之明，逐步上升达到先见之明的。

大量的“后见之明”，作为事实论据，然后形成理论性极深刻的“先见之明”。中国的问题，确实在于取得无穷伟大胜利（甚至将灾难吹为“胜利”）之后，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李公朴《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的历史性警戒，至今仍然具有不可颠覆的现实意义。

冯士彦，武进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高级讲师。武进季札研究会理事，现受聘于淹城春秋文化研究会。

生而公朴

汤语琳

白墙青瓦的老式建筑就那般静静地坐落一侧，如今见着，心里仍猛地一颤。好像就在寻常的那间院落里，迴荡着英烈低吟的悲歌。仅这一瞥，便使人肃然起敬了。

房屋名正言顺的前主叫李公朴，在他正风华的年纪，就去了。时常有人扼腕说：“这人呐，就是可惜生错了时代，不然一定会对这泱泱中华发挥更为远大的作用。”但他的意义，纯然是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灿烂地散发着光与热呢！

说起李公朴，首先想到的便是他那“七君子”之一的名号了。君子啊，应当是长衫翩翩，在落日西亭下吟诗作对，一挥毫泼墨就成千古绝唱的。在他手里，笔便不是遣兴之物了，对他而言，是最称手的武器啊！《全民动员论》《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枚举不胜，他用几十来万的笔墨，将有志青年们鼓动了！振奋了！聚合了！这是多么可贵的力量！

你若是来武进走走，就不难发现，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学，就在他的故居旁安静地站着。这恰恰说明他另一个被后人称颂的经典。他在抗战前毅然担当起“全民教育”的重任，携着另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起了社会大学并任职副校长。人们常说“少年强则国强”，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总是充溢着磅礴的激情，愿为祖国奉献的。于是李公朴执教，将他的思想结晶剖析给学生，集结更多的新生力量。勇气与学识并存的他们，才敢昂着头，挺着胸，用最热情的、整齐的声音呼吁：我们绝不是孤军奋战！

这便是李公朴的教育理念和领导才能啊！只需要一个目的，一个共同的方向，全中华的年轻力量便能汇成一柄利剑，刺穿黑暗。

这个伟人，办过报纸，写过论文，教过学生。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华的进程，恰好燃起了一盏灯。或许小得不足以向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撒去光明，但是它足够亮，足够



暖，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方圆里其它跳动的闪烁的火光靠近。

归根结底，他的灵魂总是能用一个词来概括的，那就只能是“爱国”。至死不渝，宠辱不惊。

他驻守昆明，且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李公朴带有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想必暗中已开始了铲除李公朴的谋划。也许前一天还呼吸着夹杂着露水的空气，后一会就与人间长辞了。我想，他该是波澜不惊地显示礼貌的风度，然后说出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

“为了民主，我已准备好了，两只脚踏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了。”

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早将“死”这个字看淡了，像是不过如眨一眨眼一般最为稀松平常。若是真走了，想必他只遗憾未能给祖国、民主奉献更多，而不会埋怨，更不会后悔。

1946年的7月11日，李公朴与夫人外出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束了他有些短暂却出彩的人生。

这个男子，曾被闻一多肯定：“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曾被周总理点赞：“他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甚至连毛泽东主席也赠予他《破长城图》，“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便写出了革命者终生的豪情。

他，生而公朴。无需多言，便在中华史册上闪耀着独有的光芒。

汤语琳，湖塘桥中心小学学生。

两种数字化采集技术在可移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张彩英

摘要:作为地方博物馆的一名普查员,针对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程中遇到的诸如可移动文物影像数字化采集、制作等问题,尤其对于艺术观赏、历史价值较高的文物,平面化图像存在无法真实还原文物原貌难题,就超高清视频技术和三维数字化技术在可移动文物数据采集中的重要作用和实践方式提出个人陋见浅识,以为为地方博物馆提高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和保护水平提供借鉴。

关键词:可移动文物 地方博物馆 超高清视频技术 三维数字化技术

2012年10月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式启动,这是建国60多年来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是确保文化安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措施,也是健全文物保护体系的重要基础工作。普查分三个阶段进行,其中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调查、文物认定、信息采集和审核,内容囊括了文物名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包含数量、来源方式、入藏时间、藏品编号、收藏单位名称等14项基本指标。作为一个庞大的文物收藏群体,地方博物馆是此次开展普查工作的重点单位。因此,本次文物普查实质上也是地方博物馆进行一次文物藏品档案制作整理完善和文物资料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地方博物馆作为一个地区的文物收藏单位,肩负着文物收藏保护、研究鉴赏和宣传教育的重任。而作为博物馆一切业务活动的基础,文物的信息资料对此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对推动地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文物普查进行过程中,地方博物馆由于主客观因素,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可移动文物影像数字化采集、制作和保存就是一大工作难点。胶片和数码

相机一直是影像采集必备设备,但胶片在后期冲洗、保存、复制等利用环节非常繁琐、复杂;数码相机虽然可解决影像存储和复制的难题,但图像仍有平面化的缺陷,无法真实地还原文物原貌。鉴于各地方博物馆发展情况不同,笔者认为,应在使用数码相机采集影像的基础上,对艺术观赏、历史价值较高的文物,采用超高清视频和三维数字化并用的全新采集方案。

一、超高清视频影像技术的应用方案

(一)地方博物馆可移动文物影像采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影像的最终用途,地方博物馆藏品影像基本分为两类,即档案影像和展示影像。档案影像要求保真,对文物的器型、色彩以及各部分的比例关系都应做到极尽准确,这样在用于出版传统的展览图录,或数字博物馆藏品介绍的栏目时,不至于因过分突出细节而干扰观赏者对整件藏品的鉴赏;而对于文物完残状况、衰老老化程度、损伤评估等保管记录,高保真的档案影像更可以提供精确的影像凭证。由于档案影像能够详细全面地记录文物的每一个细节信息,因此在地方博物馆文物信息采集工作中重要性最高,是形象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资料。

可移动文物,就形制而言可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种类型。平面文物主要是古籍善本、书画、织绣等,对这部分文物的影像采集,不少博物馆已经开始使用大型平面数字扫描仪。立体文物的采集方式则基本上是以数码相机进行的,以图片影像资料形式进行档案存储,基本可以满足文物档案基本信息的记录要求。但这样的采集方式存在问题:一是文物影像采集信息不全面,不能保证全景无死角地完整记录文物影像信息;二是数码相机采集的档案影像采集标准相对较低,所采集的影像不能得到更广泛的利用;三是如果文物影像采集不全面,会造成文物重复提取和多次拍摄,于文物而言存在安全隐患;四是档案影像采集工作周期较长,地方博物馆需要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成本可能会超出可承受范围。

(二)超高清视频影像技术应用实践

随着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可移动立体文物影像采集的壁垒将被打破,新技术有望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超高清视频影像技术便是一个可研究的发展方向。超高清视频是动态影像,以PAL制的每秒25帧进行拍摄时,每拍摄一秒钟视频素材,就能获得25张4096×2160分辨率的数字影像,如果用超高清数字摄影机拍摄可移动立体文物,在60s内全景拍摄一件文物,就可以获得1500张4096×2160分辨率的数字影像。数码单反相机最快的连拍速度为每秒14张(佳能1DX),要在保证影像清晰度的前提下完成1500张的拍摄时间要远远大于1min的时间,由此可见,高清数字摄影机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目前,国内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利用4K超高清视频影像技术开展了对立体文物影像信息采集的测试。他们采集实验采用的是Sony F55 4k摄像机,通过对选取的具有代表性

和共通性、作为文物替代品的工艺品进行实验,证明利用数字摄影机以RAW模式对文物进行视频影像采集,并对所获得的视频影像进行静态图像提取及存储的办法是可行的,所获得的图片画质清晰、层次丰富,并且像素尺寸可达到相当于1000万像素数码相机所拍摄的画质,完全可以满足文物档案影像信息存储的要求。并且,通过摄像机的一次拍摄,还能同时获得视频及照片两种影像信息,不光可以提高可移动立体文物影像采集工作的效率,并且还能拓宽档案影像的利用。

在目前的数字发展水平来说,此项技术可谓一举多得。而对于人少事杂的地方博物馆而言,在更新的影像技术出现之前,此举无疑可“一劳永逸”,并且对于文物的保护更具现实价值。

而在视频影像信息采集方面,视频影像连续不间断的影像特性,能使文物得到更全面生动的展示,而不再只是一张角度单一而“扁平”的照片。例如,非对称造型或人物造型的文物,可做到360°无死角影像信息采集,从而可以使其在数字博物馆及多媒体展示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鉴于故宫博物院对超高清视频影像技术的应用测试,地方博物馆在进行此项应用时,应首先进行采集试验,积累一定的拍摄经验后,方可进行批量采集。对于前期试验步骤设计,应着眼以下四个方面:

1.文物类型选择

选用具有代表性和共通性的工艺品作为试验文物替代品。拍摄过程中所用采集设备必须与文物(被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且设备本身在稳定性(牢固度、发热属性、移动属性)上满足文物保护的要求,一切以文物安全为前提。

2. 视频数据属性要求

拍摄所得的超高清影像数据必须满足后期主流制作的硬件及软件方面的兼容性,并且保证在长期保存和利用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拓展性,比如视频格式的设置、色域范围的选择、单帧(数码照片)格式输出等要求。

3. 视频采集过程

在完成前期拍摄准备后,即可进行可移动立体文物的拍摄。首先将被拍摄物(文物替代品)放置于专业的文物拍摄电子旋转静物台上,确定画面构图,根据器形大小、形态、文物的文化特征布置灯光效果。因拍摄使用的是连续光源,与日常拍摄使用的闪光光源有较大区别,连续光源可以使摄影师更直观地看到立体文物的光影造型,明暗反差,而且使用低温高显色照明设备光源输出稳定,光源散热比闪光灯还要低,完全可以保证文物安全。当拍摄设备有重大调整或有其他威胁到文物安全的行为时,可暂将文物移至安全可靠的区域。

4. 视频后期处理

拍摄完成的视频文件为XAVC视频格式,首先将未经任何技术处理的原始视频文件中利用DaVinci或Premiere视频剪辑软件输出单帧画面,可选择TIFF、PNG等图片格式。将提取的TIFF数字文件导入Photoshop进行修图及色彩管理,对拍摄完成的视频影像通过DaVinci进行亮度及色彩校正,或者直接将原始文件存入视音频媒资数据库中,可根据利用需求制作成AVI、MOV、MP4、GIF、TIFF、JPG、PNG等主流通用的数字文件。

二、三维数字化采集应用方案

(一) 地方博物馆可移动文物三维数字化研究现状

目前,地方博物馆三维数字化建设受数据生成的核心

技术制约,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突出表现在建设成本太大、制作耗时太长、数据标准太杂、专业门槛太高等四个方面,亟待以核心技术的突破来化解瓶颈问题。

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经过30多年的积累,已经在机器人导航、影视娱乐、虚拟现实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技术通过使用不同角度下拍摄的图像,利用特征检测、匹配、相机标定等方法,可以还原出相机与场景的关系并同时恢复出场景的三维结构。相比目前在文物数字化生产领域占绝对主体的基于结构光和激光扫描的数据生成方式,基于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具有数据采集方便灵活、硬件成本低廉、自动化程度高等诸多优势,在文物三维数字化领域也很早就引起了关注,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应用。但是由于该项技术专业门槛高、算法难度大,国内尚未形成相应的软件,目前市场上主要软件都是国外的,如Autodesk 123D, Smart Acute3D和PhotoScan等。尽管这些软件已能够满足数据生产要求,但软件的非自有性决定了数据格式单一无法实现功能定制,难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二) 基于图像的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应用实践

目前国内已研发出基于图像的三维建模应用软件,该软件基于特征检测与匹配的相机自标定算法、基于特征扩散与深度图融合的稠密重建算法以及基于Poisson算法的点云构网及纹理一致化算法。算法具体情况如下:

1. 相机标定。多视图相机自标定是利用影像中场景或物体的同名特征点解算相机与场景的相对位置关系和成像模型。

2. 稠密点云重建。在相机标定获取的成像模型基础上,利用多视图特征点匹配与扩散、滤波等策略,实现场景(或

物体)表面的稠密点云重建。

3.网与自动纹理映射。对重建的点云构建场景(或物体)的网格表面,并通过遮挡分析,实现纹理自动映射。

地方博物馆使用三维数字化软件采集技术的优势:

一是建模对象广泛。对纹理较为丰富、结构相对简单的可移动文物(包括石器、陶器、铜器、金银器、瓷器、漆器、玉器、工艺品等)均可实现高精度快速三维建模。

二是成本费用低廉。相比国内普遍采用激光扫描进行文物三维建模,使用三维数字化软件可降低成本到1/5倍以下。

三是品质高度保真。获取的文物三维模型,几何精度 $\leq 0.2\text{mm}$ (与普通激光扫描设备精度相当);纹理精度与图片保持高度一致(全自动纹理映射,优于激光扫描),效果与Autodesk 123D, Smart acute3D和PhotoScan等国外软件相当。

三、结论

馆藏文物数字化建设在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早已开展并投入使用。但地方博物馆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缺乏、人员短缺及日常工作量大的情况,大部分博物馆都没有建立数字化的藏品信息数据库,基本以传统的手工记账的单一形式为主。尽管纸质账本是文物记录的必要手段,但是在查阅时难免费时费力,经常翻阅还易造成原始资料受损,不利于账本的保存。应运而生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旨在建设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形成全国藏品信息资源总库,对可移动文物信息的采集提出了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可谓助推地方博物馆全面实现数字化的契机。

而对于数字化工作的基础——文物影像采集工作,笔

者认为,地方博物馆不论于安全管理抑或人员因素而言,利用优势技术资源无疑是提高数字化水平,保障文物安全的周全之举。因此,地方博物馆应该充分利用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机,借助现代超高清影像视频技术和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对每一件可移动文物建立详细完整的信息档案,充分展现文物的艺术观赏、文化研究价值、实现文物知识的传播。同时,提高博物馆的信息化水平,保障文物安全,永久保存完整的文物信息,使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更加高效、规范。

张彩英, 武进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

参考文献:

- ①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实施方案[EB/OL]》. <http://web.wwpcc.net.cn/gjwjg-zw/zcwj03pq/201407/4bd4f7alaa4c47618db52189da63f838.shtml>, 2013-03-12
- ②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 31-49
- ③王迪《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采集登录工作初探[J]》黑龙江史志, 2015, (5): 211-212
- ④冯伟夏《增强现实在博物馆数字展示重的应用研究——以广彩展示为例[D]》广东工业大学, 2015. 41-43

小议基层文物宣传工作

——以高淳区文保所为例

邹荣建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这不仅仅是我国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更是代表国家的“金色名片”。

我省文物资源丰富,做实做好文物宣传工作,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在我省逐步健全“5个体系”、实现“6个100”重大工作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物宣传

文物本身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通过文物保管所和博物馆等相关场所,以实物、图片、视频、标语等形式,向社会群众传递文物信息并普及文物法规,是文物保护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文物宣传工作由来已久,从张謇于1905年创办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至今,每项具体工作都从无到有、由微至著,都是靠着每一位文博人一点一滴的实干。文物博物馆系统的逐步成熟和完善,都依靠着文博人心中的梦想,放开胆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甩起膀子,凭着真打实干才取得了今天的业绩。

2016年1月13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一章总则中第四条:“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可见,文物宣传工作不只是文物部门的事,而是需要多个部门联动协作来共同完成,从

而达到预定的效果。同时也不难看出,文物宣传工作中所蕴含的元素只有从多层次、多角度来展开,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对文物及文物保护有较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二、基层文物宣传工作现状分析

在面对所辖区域范围广、分布人口多、经费紧张等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大多数活跃在文物保护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都以一腔饱满的热情去面对繁杂琐碎的事务,以耐心、恒心、责任心去努力完成好每一项文物工作。文物工作无小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这样说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8个字极凝练地指出了文物工作的重要性。而我们正在进行的宣传工作正是其中之一。

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物宣传工作,一线基层工作者、学者都纷纷边实践边钻研,努力创新,开拓出属于我们、属于当下的宣传之路。大家将工作中的心得体会,落纸成文,供同行和后人参考。如吉林省镇赉县博物馆的韩宇同志在《谈县级文管所文物宣传工作》一文中就专门针对县一级的文物宣传工作如何进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面对县、区一级、尤其是包括农村地区的工作时,非常有针对性,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时代在发展,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文中的一些观点和做法置诸现今可能就有些不合时宜了。黄建秋先生的《文物法规宣传和文物保护方法策论》一文,以其丰富的基层工作实践经验和精深的文物博物馆理论对如何开

展文物宣传工作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文中举出相关的文物法条例,并辅以具体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同时以此为切入点,道出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对客观且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高淳区文保所文物宣传工作

高淳区的文物工作和其它区的一线基层工作相似,都遇到了经验匮乏、经费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的系列问题,但依靠着一代代高淳文博人的决心和努力,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尤其是文物宣传上做出了新意,取得了成绩。

(一) 历史回顾

宣传工作中,成功案例不在少数,其中双女坟宣传工作的成功尤为典型。双女坟位于南京市高淳区城东南约15公里的固城镇花山附近的蒋山李家村,发掘之后高淳县政府高度重视,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现为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组织专业人才,联合国内外学界,召开学术研讨会,在文博学界内引起重视和共鸣。韩国学者来到高淳学习考察,并与当地知名文博学者、当时的文物保管所所长濮阳康京先生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2012年南京市博物馆经考察认定此处为古驿馆遗址和双女坟,墓为汉代形制;2012年8月下旬,韩国国家电视台专程赶来双女坟进行了实地采访。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宣传活动提高了双女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2、借助区内多种渠道媒体对双女坟的发掘工作进行正向报道。文保所配合高淳区电视台、高淳报社,通过群众喜闻乐见、传播覆盖面广的方式,以短、平、快的节奏,在地方新闻报道、电台新闻快递中作报道,向社会大众传递这一文化大事信息,让高淳的乡亲父老都能知晓双女坟。同时,文物工作人员连同社区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通过橱窗张贴展览、布告栏,向住户发布信息。

在价值,如学术价值、旅游价值、社会公益价值。联合国内外相关文物机构、协会,召开学术研讨会,挖掘文物内涵,呈现历史原貌;牵头商务局、旅游局,探讨双女坟作为景点的潜在经济价值和可操作性;与社会公益组织机构合作,探讨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 目前工作

双女坟所取得的成绩已成为历史,经过历届高淳文保所同仁的努力奋斗,我们曾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现在的文物宣传工作则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具有更为鲜活的韵味,我们奋斗在文物一线的80后、90后们则需要以饱满的热情面对更为直接的挑战。我作为文保所的一员,承担了这份富有新意、责任重大的日常工作。

1、积极拓展自媒体渠道,传统与创新双管齐下。

服从组织领导,严格管理发布内容。严格按国家“及时、真实、准确、合法、合规”的要求,紧扣本单位业务,按需上报宣传信息,以文字、图片的形式介绍高淳本土文化、普及文物相关知识。

保量促质,实现从规模效益到精品效益的转型。网友群众已不仅仅满足于简单大量的文字知识信息,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网友群众的回复、私信来做出相应的信息内容上的调整,不断学习进步,挖掘新题材,开设新栏目。例如,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就根据网友的反馈,在微博上推出了《高淳民居》、《高淳陶器》等两个专题栏目,分别对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文物信息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受到了网友的欢迎。

加大行业内兄弟单位、个人间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升本地区自媒体影响力。2015年笔者在微博上报送的文物宣传信息,由承德避暑山庄官方微博转发后,达到118次的转发量。

笔者通过微信公众号(名为“高淳区文物保管所”)转发国家文物的相关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业内新闻如:《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开国上将刘亚楼旧居遭强拆》等,让文物信息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通过便捷、传播范围广、信息易获取的自媒体渠道,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广大网友对于高淳地区文物的认知度。

2、建立文物保护志愿者制度,打造志愿者队伍

文物保护志愿者是基层文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有生力量,他们是文物保护大部队的民间先锋队、构建宣传长效机制的助基石。因此,高淳区文广局、文物保管所动员辖区内各镇文化站,组建了一支52人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该举措是文物基层工作的创新,它以高淳文物资源分布特色为基点,依靠文化站,依靠群众,来共同完成宣传工作。

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以来,不但肩负了日常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巡查、拍照、记录、上传工作,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巧妙方式向身边的群众传递了文物基本常识和文物法信息;不仅提高了普通群众的遵守文物法的自觉性,同时带动群众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积极性,最终形成整个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健康的文物保护氛围。

三、文物宣传工作之我见

(一)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志愿者制度,壮大志愿者队伍,形成正向社会效应。

目前,我国的文物志愿者大部队并未形成,也只是在一部分省市地区进行了试点。文物志愿者对于文物巡查、保护、宣传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发展较早、较好的有宁波市鄞州区,他们早在1976年就在全国首创建立了业余文保员制度,有数百名业余文保员守护着他们辖区内的文物。他们在区内各乡镇也都建立了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构建了区域的文物保护网络。鄞州区的案例对全国基层文物的保护、宣传工作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启示意义,值

得同行学习研究。

形成长效机制,严格规范制度。依靠政府重视进行财政补助、相关职能部门授权管理、明确责权、落实到人。每件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固定人手,形成三定——定人保护、定点落实任务、定期检查,最后以年终评比对先进个人进行奖励。由文物行政部门联合相关院校举办系列理论及实践课程,对业余文保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外出学习考察。

(二) 以文化遗产日、博物馆日为重要节点,联合同级博物馆开展文物宣传工作。

高淳区文保所和博物馆原是一家,直至2014年岁末才馆所分设。但是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却并不会因此而分家,而是需要两家在更为广阔的专业空间和领域中,依靠更多的专业人才队伍,花更大的心思和力气,去共同努力完成。我们须花大力气深入挖掘研究文物价值内涵,推出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群众喜闻乐见且教育意义鲜明的文物陈列展览和相关出版物。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在职员工的专业特长,共同开发文创周边产品。如:带有文物宣传logo的环保手提袋、书签、笔记本。以此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明风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如大中学生、知识分子、普通参观者,根据他们不同的心理需要,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主题活动,加强文物展览、展示和宣介、教育工作,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弘扬主旋律,融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为一体的陈列展览,努力营造人人爱文物、人人自觉保护文物的良好氛围。

(三) 提高文物工作者专业技能、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意识。

在文物宣传工作中,我们要不断地端正态度,不忘初心,积极进取。及时学习国家关于文物的政策文件,领会精神,便于更好地应用在日常工作当中;从多渠道、多角度了

解行业信息,做到与时俱进。文物基层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只是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工作水平,还需要政府高度重视,拨出专项资金对在职工作人员以及文物保护志愿者进行专业技能业务培训。更新理念、充实内容、强化功能、扩大层面,调动文物博物馆单位用活文物资源的积极性,真正将文物宣传工作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四) 严格规范文物宣传信息管理

建立工作信息汇聚机制。确保发布信息内容和样式的多元化,做好内部协调工作,与局信息管理员和各兄弟单位进一步加强工作交流。

建立健全媒体舆情处置机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查看网民反馈的问题和宝贵建议,及时、谨慎、依法依规地解决群众对于文物方面的来访问题。

(五) 积极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文物宣传并非孤立的工作,在现代需要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于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高屋建瓴,这就需要基层工作要落实到位。我们文物系统的宣传工作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从本地的地理、经济、旅游等基础产业出发,将文物宣传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相结合,依托文物资源积极发展旅游、特色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使其成为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助推器。

四、结语

搞好文物宣传工作,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契合我国的十三五规划,是新时代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须以有利于文物保护为前提,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坚持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坚持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深入挖掘和拓展文物蕴含的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和时代精神,不断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让文物宣传“活”起来。最终,文物宣传工作要融入现代的生产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添砖加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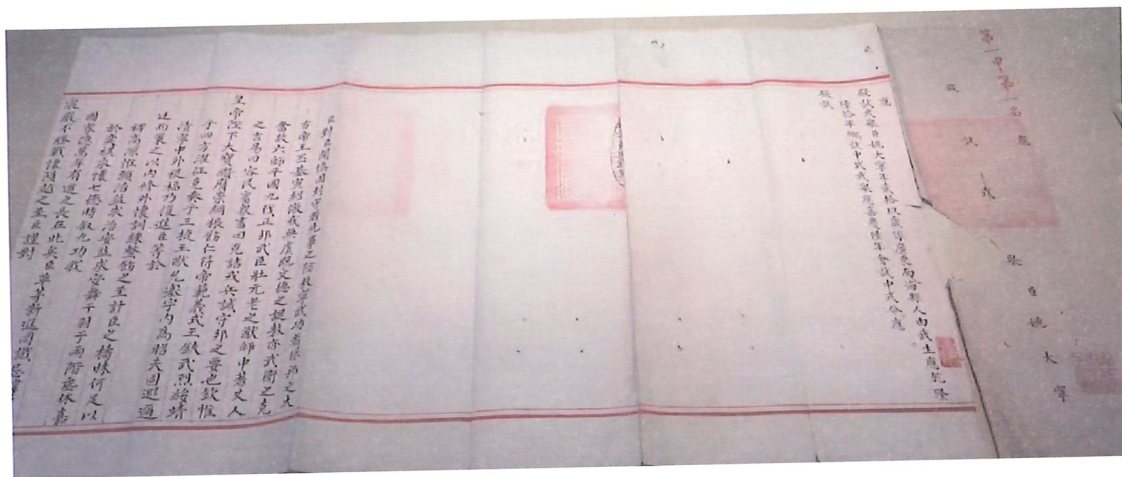
邹荣建,南京市高淳区文物保管所。

参考文献:

1. 黄建秋. 文物法规宣传和文物保护方法策论[J]. 中国文物学会通讯2001、2002年合订本,2001,(2): 106-112。
2. 韩宇. 谈县级文管所文物宣传工作 [C]. 中国吉林松原:吉林省博物馆协,2011. 661-664。
3. 严红枫、章燕飞、谢国旗. 宁波鄞州两百业余文保员活跃乡村[N]. 光明日报,2003-8-12(2)。
4. 单霁翔. 团结奋进 务实创新 努力开创文物宣传工作新局面——在全国文物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9日(00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十一条款。

纸本古籍的改装鉴别初探

朱煜



近十年来,我国对古籍保护越来越重视,投入的经费也逐年增加,评定了上百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设立了数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修复人员也从全国不足百人到现在的一千余人。随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古籍修复工作的开展,笔者在长期的古籍保护工作实践中,遇到了大量经前人修复改装的古籍,为了能使这些重新装帧过的古籍恢复原貌,遵循“修旧如旧”原则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探索。本文初步探析汉文纸本古籍的装帧形式演变以及近现代人对古籍的改装原因,总结了一些浅显的古籍改装鉴别经验。

1. 纸本古籍的装帧形式及演变

在我国历史上,文字记录的载体初期并不是纸张,而是甲骨、金属器、竹木简、丝帛等,因为这些载体的不同,古籍的装帧形式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探究唐宋以降纸本古籍的装帧演进与改装鉴别。

1.1 卷轴装

任何新的装帧形式都是对前一种书写材料的装帧形式的继承与改进。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卷轴装作为纸张大量应用之前书写材料的常规装帧形式,产生在书籍仍旧依靠手写的模式下,所以其装帧形式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这个阶段,纸本古籍采用卷轴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2 经折装

卷轴装的缺点就是展开后长度太长、长时间的舒卷容易使之翘起,导致阅读不便。受佛教的影响和雕版印刷的兴起,从唐代开始纸本古籍的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经折装的过渡。经折装就是将书写好或印刷好的纸张文本单页,按照一定的行数或宽度粘结起来,然后一正一反地折叠,加上封面和封底,最后形成长方形的纸本。这种装帧形式在宋以后的世俗生活中并未得到普遍使用,多见于宗教文献的装订。

1.3 蝴蝶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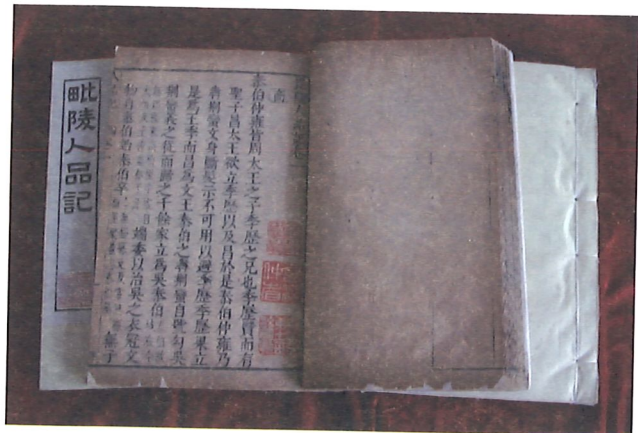
鉴于卷轴装的阅读不便和经折装的折口容易断裂,雕版印刷盛行后,作为印刷品的古籍单页不能再随意地裁切,蝴蝶装作为一种新的古籍装帧形式便应运而生。宋代盛行的蝴蝶装,就是将一版一版印刷好的书叶,子口向里对折,若干叶为一册,装上整个的封面封底,用浆糊粘连。当时的蝴蝶装,为避免折口处损伤文字,特在中间空上一行,刻上鱼尾、书名卷数。因为打开书本阅读时,书叶翻动向两边翻飞,状如蝴蝶,故该装帧形式命名为蝴蝶装。

1.4 包背装

蝴蝶装的书籍在实际使用中,经常会翻到无字的反面,而有字的正面因为印刷的墨迹经常粘连,难以揭开阅读。为改良蝴蝶装的缺点,大约南宋时发明了包背装。包背装就是将书叶正折,版心向外,书脊处用浆糊黏接墩齐再包上封面。这样有字的一面更便于阅读,无字的一面折在背面,不再影响阅读。

1.5 线装

线装是目前广为人知的一种装帧形式,也是存世古籍应用最普遍的装帧形式。明代中期以后,线装成为我国古籍装帧最主要的形式,它的优点在于样式美观、阅读方便、装订牢固、不易散失。线装在折叶方向和包背装一致,都是版心向外。差别有两处,一是在于书背处,线装打眼装捻(北方多见纸钉,南方多用纸捻);二是书皮,包背装书皮是一整张,而线装是前后各加一张裁成与古籍折叶大小相同的封面封底(线装古籍的封面封底分为扣皮、单扣、套筒等)。最后打眼穿线装订成册。



2. 古籍改装的现象及原因

流传至今的许多古籍,装帧形式早已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现当代发生的改装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根据古籍所有人的不同,古籍在近现代的改装可以分为公藏单位的改装、民间收藏机构的改装和个人藏家的改装。

2.1 公藏单位的改装

公藏单位作为永久性保存收藏机构,其改装古籍,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历史原因,比如人员的专业性、修复材料的优劣、设备的齐全与否等等,导致了古籍在保护与修复过程中,产生了非专业的改装和有保护目的的改装。

2.1.1 非专业的改装

以笔者所知的江苏某馆为例,就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古籍非专业的改装,这在许多的市县馆中具有代表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图书馆的领导就意识到了古籍的重要性与古籍保护的紧迫性,这在当时图书馆馆舍面积小、经费紧张、人员编制少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很具有前瞻性了,但是因为诸如上述的局限,当时除了省级以上的图书馆有专业人员开展古籍修复业务,在当地根本找不出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单位苦于招聘不到古籍修复的专业人才,在一些热心读者和书画爱好者的建议下,本着书画装裱与古籍修复相通的理念,引进了原某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装裱人员,在图书馆古籍部设立了古籍修复室。在修复实践中,古籍修复与字画装裱的流程与细节是有差异的,在修复那些破损古籍中,许多古籍封面、护叶被遗弃,换上了崭新的封面、封底和护页。基本上那二十年间所有的书叶都被托了一层覆背纸上墙绷平,下墙后裁方,古籍的厚度和大小都放生变化。纸捻未装,原书眼堵死,重新打孔装订,许多古籍经过这样的修复,已经丝毫看不出原有的面貌。甚至有些后来上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装裱人员的确是非常兢兢业业,仅2009年经他的手托裱装订的古籍就达到了700余册。就在那个时期已经是竭尽所能做到的保护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复,又经过几次馆舍的搬迁,可能许多古籍都要散失,难以恢复。当时馆领导愿意从紧张的办公经费中划出采购设备和材料的费用,也实属不易。

2.1.2有保护目的的改装

公藏单位发生有保护目的的改装,都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古籍,尽可能多地保存古籍原本的信息。经典的案例就是张士达先生为国家图书馆修复《陶渊明集》。原国家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拿出破损严重的宋刻蝴蝶装《陶渊明集》,交给张士达先生进行修复,要求保持古籍的原来形式。张士达先生后来发明了“蝴蝶装金镶玉”的形式对该书进行修复,将原书页包在镶纸内,免受光照、灰尘、人为翻阅的磨损,从而达到古籍善本保护的目的。“蝴蝶装金镶玉”的形式在古籍装帧历史上是没有的,是后人为了保护古籍、为古籍续命而产生的发明创造,是出于保护的目进行的改装。



2.2民间收藏机构的改装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古籍作为可移动文物的收藏行情,从以前相较于字画、玉石等热门收藏的无人问津,到如今的炙手可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间收藏机构的古籍改装人员配置,从历史上来说,专业古籍修复师基本上都是出自民间书坊和私人藏书家的书房。

2.2.1古籍拍卖的商业化改装

笔者求学期间曾经在江苏某古籍拍卖公司兼职过数月,经历了该公司的古籍拍卖业务从草创到第一次秋拍的完整过程,也为该拍卖公司修复过数套上拍古籍。

以拍卖为目的的商业化古籍改装,都是为了谋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这样的商业改装,很多时候可以说不计成本的将古籍做成精品,不在乎装帧形式的改变,古籍开本尺寸的大小,以市场风向为修复导向。例如某无装具的单册古籍,为了显示出更好的视觉效果,往往会按页数或卷数拆

分成两册,采用金镶玉的装帧形式,加上漂亮的绫面书衣,并且配上同为绫面的函套或是仿金丝楠木色的书匣,以示珍贵。这样改装后,一册就成了两册,小开本变成大开本,装潢得华丽雅致。原书装潢差劲的或者太“山寨”的肯定被重新改装了,经济效益一下子就激增。拍卖为目的的商业化修复,并非都是走的艳俗之路,绝大多数是以内府藏书和官刻为模范,堪称是改装中的精品。

2.2.2以盈利为目的古籍修复公司的改装

盈利为目的古籍修复公司或个人工作室,他们的修复以客户的需要为古籍的改装方向。例如客户要求改装成精装书,则会参照某些传世藏品或者展览拍卖里的展品进行改装和修复。再例如面对同一样装帧形式,每个客户喜好不尽相同。就册页而言,有的人喜欢大开本的,有的人喜欢小巧的,有的人喜欢雅致的,有的人喜欢华丽的,有的人想便于保存携带翻阅的,有的人追求改装后显得量大“土豪”的。作为盈利为目的的古籍修复公司,必须满足客户的要求才能在经济社会生存,定然会出现千形万式的改装。在这个过程中,不好的书籍装潢必然会被舍去,只能商量着保留一些可取的。

2.3个人藏家的改装

古籍的个人藏家出于爱书、护书的简单愿望,都会对自己家藏的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在寻觅不着专业的修复机构和个人或是为了节省修复费用,往往就是撸起袖子自己动手。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古籍上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装帧形式和修复材料。

因为近几年的文物热、收藏热,笔者在工作中遇到将家传古籍拿来鉴定的,其中有使用胶水、胶带粘书、订书机装订的粗暴手段,用打印纸和报纸修复破损处是常有之事,更有甚者有用针线缝书口和书的四边。

3. 纸本古籍是否改装的辨别方法

经手某古籍时,判断其是否经过改装,笔者提出以下鉴别方式。

3.1珍善本参照国内外公藏机构的馆藏古籍

珍善本的重要性在此不须赘言,收藏有这类古籍的公藏单位一般珍而视之,不会随便进行修复和改装,能找到副

本进行对比最能看清情况。国内的公藏机构目前在自己的官网上还没有珍贵古籍的扫描件可以下载,可以多查阅国外的大型图书馆官网。比如日本的许多国立大型图书馆都将自己的汉文善本附上标尺做成书影,放在官网供读者下载,非常方便。

3.2古籍原书上手鉴别

对于找不到参照的古籍,可以从古籍原书本身上查找线索进行判断。

3.2.1看颜色

看书口、书脊和天头地脚,将这些地方的颜色和书心进行对比。古籍经过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光洗礼,会慢慢老化发黄,颜色变深。这些变化现在在书口、书脊和天头地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产生过破损的修复及装订时经打磨裁切的改变,这些部位颜色会变浅发白,和书心颜色接近。

3.2.2看痕迹

凡是后期经过改动的古籍,即使是再仔细齐栏,都是不能保证书口、书脊和书头书脚处齐平。古籍在制作之初,都是制作后经过铡刀的切齐,凡改订后装的古籍,只要不是经过打磨,书口、书脊和书头书脚处的书叶就会参差不齐。

3.2.3看版本的历史时期

通过确定古籍的版本情况,查明该书产生的时代,譬如明代还是晚清、抑或是民国时期按传统的印刷形式进行装订的,其装帧形式是否符合那个时期的形式。比如宋代肯定不会用线装,清代也不会用龙鳞装。

3.2.4看古籍的珍贵价值

例如明清以来,内府刻本的“金镶玉”都不多,因为其需要衬纸,工序繁复,纸张浪费较多。古人秉着“抄纸不易,用者宜珍”的精神,非善本不用“金镶玉”。但是近现代以来,许多的爱书人都较为推崇金镶玉装,将许多的古籍都改装成了“金镶玉”,取其开本宏阔,装潢美观的优点,大量改装。某种古籍,如果装帧形式复杂,可以先查询一下该书的存量情况,对比市场行情,判断其是否原装或改装。

4.结语

作为古籍保护工作一线从业人员,面对古籍改装这样的情况,应当有着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底线,那就是不能破坏

古籍。一直以来,古籍修复都是“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修复原则也是“修旧如旧”,修复配纸讲究“宁浅勿深,宁薄勿厚”,尽量保持古籍的原始面貌,尽可能多的保留古籍的历史信息,以免影响版本鉴定。

古人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文化的精髓都被这些存之不易的古籍承载着。习总书记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指示,激励着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朱煜,常州市图书馆助理馆员,古籍修复师。

参考文献:

- 1、毕如兰.中文古籍装帧形式发展过程略谈[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4期:56-58。
- 2、张光华.我国古籍装帧形式演变述论[J].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04期:69-72。
- 3、朱兰双.我国古籍纸本装帧的历史演进[J].兰台世界2013·1月中旬:131-132。
- 4、王金玉.浅谈天一阁藏明代古籍的装帧与修复案例[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年02期:123-127。
- 5、赵红芳.浅谈中国古籍装帧的分期与形式[J].科技信息,2013年02期:480-481。
- 6、邱晓刚.蝴蝶装金镶玉:一种古籍装帧新方法[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年05期:51-52。
- 7、陈欢.古籍装帧改革探究[J].中国出版,2017年04期:51-54。
- 8、杨娅.古籍装帧的发展—从简牍到线装[J].兰台世界,2011年20期:62-63。

<编者按>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文化强区总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全区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博物馆作为推广文化的大型公益机构，始终积极参与开展“文化100”“文化点亮生活”“武进市民艺术节”等大型主题文化惠民活动，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提高了大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我们还围绕“浪漫春日”“七彩夏日”“高远秋日”“缤纷冬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参与度、互动性和满意度。现已形成“以建设武博教育课程”为目标，结合“我们的展览”“我们的节日”“我们的名人”开展“武博国学讲堂”“历史文化巡展”“博物馆小课堂”“武博夏令营”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丰富了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2017年，我馆社会教育部共开展教育活动25个，180场次，惠及未成年人超万名。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许“新”愿·绘美“锦”——博物馆里过大年

2017年，大年初一，武进区博物馆新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在武博少儿社教体验区，我们邀请观众一起赏云锦，共同参与画“鸡”祥，许“新”愿活动。

所谓“鸡”祥如意——新春许“新”愿活动，是围绕一棵许愿树，写心愿、挂祝福的活动。

“鸡”兆祥瑞——云锦意匠画DIY活动，则是配合“巧夺天工 灿若云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特别展”，由游客自主选择给云锦意匠画填色的活动。



TIME

大年初一

许“新”愿·绘美“锦”——博物馆里过大年
武进区博物馆

“搓元宵·做花灯·听古音”

——博物馆里闹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我馆开展了“元宵圆·花灯美”武博元宵节专场活动。20组亲子家庭共聚武博少儿社教体验区,搓元宵,做花灯,听古音,尝元宵。大家在活动中一起体验着传统节日带来的快乐。

传统节日蕴藏着宝贵的教育资源,意在通过活动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促进亲子关系,增强大家对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让孩子们在博物馆过节成为一种新时尚。



TIME

农历正月十五

“搓元宵·做花灯·听古音”——博物馆里闹元宵
武进区博物馆

“我们一起过端午” 武博端午节活动

武进区博物馆作为2017年常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的主场地之一，举行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15组亲子家庭参与了“我们一起过端午”的活动。

通过“端午知多少”小讲座，让大家知道端午节包粽子、编彩绳、挂菖蒲、画额、赛龙舟等节日风俗。

活动期间，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梅向东，武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政平等市区领导亲自为孩子们画额辟邪、佩戴长命缕保平安。梅向东部长表示：“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今天的孩子很幸福，但是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我们的根。”

本次端午活动，让孩子们感知端午、走进端午，亲身体验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而又收获颇丰的端午节。



TIME

5月30日

“我们一起过端午”武博端午节活动

武进区博物馆

欢聚武博·喜迎中秋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10月1日上午9点,一场“欢聚武博·喜迎中秋”的活动在武进区博物馆少儿社教体验区隆重举行。今年中秋恰逢国庆假期,25组亲子家庭在武进区博物馆共度“双节”。

来自武进洛阳中心小学、武进星辰实验学校、武进星河实验学校、子兮工作室的小演员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本次“欢聚武博·喜迎中秋”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节目,让孩子们对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与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活动是我馆在“馆校共建”方面的又一次创新,从博物馆课堂进校园,到今天的校园活动进博物馆,我们为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TIME

10月1日

欢聚武博·喜迎中秋
武进区博物馆

武博情暖夕阳红,携手种好幸福树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又叫“重九节”，是“中国的老年节”。10月21日上午，武进区博物馆组织45名家长、孩子们前往夕阳红康乐中心开展“武博走进夕阳红·弹奏古音享天伦”重阳节联欢会。

联欢会上孩子们表演了舞蹈《六月茉莉》，情景剧《狐狸和乌鸦》，相声《超级主持》《绕口令》，古筝弹奏《彩云追月》《春到拉萨》《战台风》，竹笛吹奏《荷塘月色》，二胡演奏《铁血丹心》《赛马》等节目，表演深受大家的喜爱。

尊老、敬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演结束后，小演员们与老人们亲切交谈，还赠送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和礼物。

本次活动通过小朋友们的精彩演绎，不仅培养了大家尊老爱老的优良习惯，还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TIME

10月21日

武博情暖夕阳红,携手种好幸福树

夕阳红康乐中心

跳动的指尖非遗

——“几何人生·乱针绣手工创意”活动

乱针绣是江苏常州非遗三宝(常州梳篦、留青竹刻、乱针绣)之一,因其绣法自成一格,被誉为当今中国第五大名绣。为弘扬传统文化,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5月20日下午,我馆开展了“跳动的指尖非遗——几何人生·乱针绣手工创意”活动,吸引了20余人参加。国家级乱针绣非遗大师孙燕云亲临现场授课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勤劳的结晶,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传统技艺最佳的传承,是让它走入大众生活”。此次活动采用展品展示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大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



TIME

5月20日

跳动的指尖非遗——“几何人生·乱针绣手工创意”活动
武进区博物馆

“双城·非遗记” 第三届武博夏令营

暑假期间，我馆举办了“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20名学生和1名志愿者家长参与活动。

夏令营为期三天，第一天参观梳篦博物馆、了解常州梳篦的历史，同时还参观梳篦生产车间，观摩梳篦制作的每道工序。参观大运河记忆博物馆和恒源畅历史陈列馆，了解常州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第二天，参观扬州博物馆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体验扬州非遗项目——造纸和雕版刷印。第三天，在武进区博物馆体验非遗项目——剪纸和亲手完成梳篦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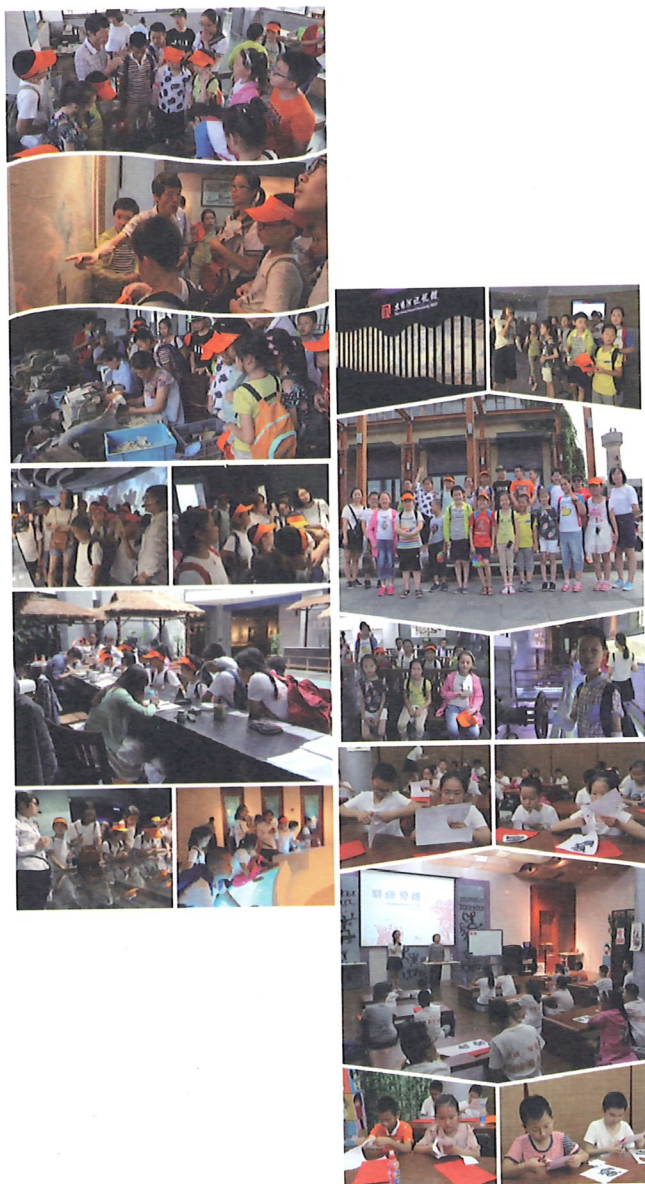
“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活动集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以“非遗”为主题，带领孩子们走访体验常州、扬州两地项目非遗，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家乡深厚的人文底蕴，加强了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认识。

TIME

暑假期间

“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

武进区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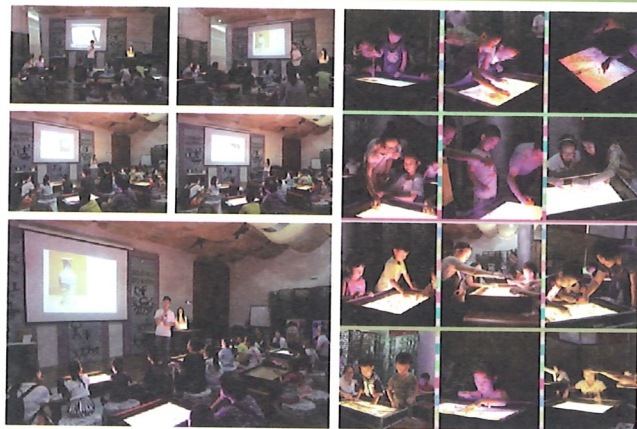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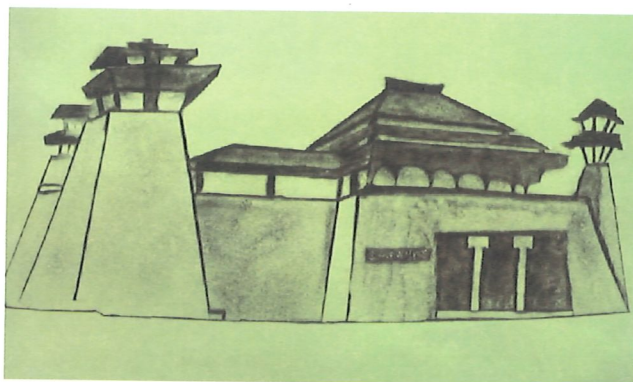


“一沙一世界” 武博暑期沙画体验活动

踩着暑假的尾巴，武进区博物馆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免费体验活动。“一沙一世界”武博暑期沙画体验活动在家长和孩子们的期待中如期开展。近70组亲子家庭走进武进博物馆，感受不一样的“沙”和“画”。

“宝剑锋从磨励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自古以来，梅花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活动中，我们以馆藏文物“青花冰梅瓶”为依托，在孩子们了解文物的基础上，通过“青花冰梅瓶”上的“梅花”图案，进行沙画体验创作。

孩子们在沙画体验活动中，不仅了解了文物的基本知识，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建立了自信，大胆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TIME

暑假期间

“一沙一世界”武博暑期沙画体验活动
武进区博物馆

特色展览配套社教活动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花儿朵朵开

2月19日,14位参与者相约武进区博物馆。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首先参观了“巧夺天工·灿若云霞”南京云锦展,从感官上对云锦有了初步认识后,便前往少儿社教体验区了解油画的基础知识,在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孩子们用丰富的色彩、巧妙的构图,描绘出一幅幅“油画上的云锦”。



TIME

2月19日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花儿朵朵开

武进区博物馆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蝴蝶翩翩飞

2月26日,12组亲子家庭在武进区博物馆参加“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在我馆工作人员介绍活动内容之后,油画老师为大家介绍基本的绘画技巧,以及蝴蝶的画法和配色并现场指导。经过大人、小孩们默契配合,你一笔我一画,一只只美丽的蝴蝶跃然纸上。

通过此次活动,参与者认识到,博物馆不再是一座严肃、高冷的历史殿堂,而是收获快乐、放飞梦想的乐园。



TIME

2月26日

“当云锦遇上油画”专场活动之蝶蝶翩翩飞

武进区博物馆

五一长假第一天，我去宋代健个身

4月29日，25位孩子走进博物馆，参观“万色万相——福建省建阳博物馆建盏精品展”，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宋代人饮茶、斗茶的风气和富裕闲瑕的日常生活。一场“古人的生活与运动”小课堂，告诉了孩子们宋代体育运动的丰富多彩。最后，大家体验蹴鞠（足球）、掇石墩、投壶等宋代就有的运动项目。



TIME

4月29日

五一长假第一天，我去宋代健个身

武进区博物馆

小小设计师们的欢乐周末

5月7日, 15组亲子家庭来到武进区博物馆, 参观“万色万相——福建省建阳博物馆藏建盏精品展”, 参加“窑变纹”DIY展示盘活动。在展览中领悟活动主题, 在活动中感受建盏的文化魅力。他们化身为时尚设计师, 创作出了一件件别具匠心的展示盘。

近几年, 武进博物馆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 推出了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 深受孩子们的喜欢, 也让孩子们在活动中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



TIME

5月7日

小小设计师们的欢乐周末
武进区博物馆

健身小达人的博物馆课堂

近年来，“移动的武博”活动多次走进校园，给孩子们送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历史小课堂，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亲近历史、了解历史、感悟历史，从而形成良好的品德，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5月10日，应湖塘中心小学的老师、家长们的邀请，我们送活动进校园。近50名师生、家长们参与到“我去宋代健个身”的活动中来。



TIME

5月10日

健身小达人的博物馆课堂

湖塘中心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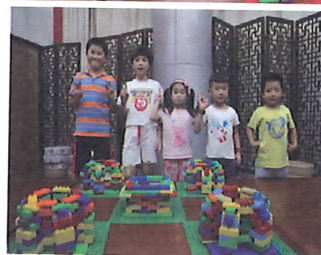
博物馆的客家之旅

——土堡诞生记

三明市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福建省内土堡最集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地区。9月16日下午，10组亲子家庭参与了“土堡诞生记”社教活动。

在参观客家民俗文物展以及聆听“神秘的土堡”客家知识小讲座之后，孩子们对于客家人、客家事以及客家物都有了直观的了解。

孩子和家长们从最基础的结构开始搭起，运用“互锁”原理，将一块块乐高积木相互拼接。经过一番努力一座座漂亮的“土堡”逐渐成型。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TIME

9月16日

博物馆的客家之旅——土堡诞生记

武进区博物馆

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

为深入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年儿童关怀和希望——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11月11日上午，武进区博物馆开展了一场儿童木工活动。12位勤劳的“小木匠”一大早来到武博少儿社教体验区，准备“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

开始动手前，孩子们参观了“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首饰让大家饱足了眼福。

通过亲自动手制作，孩子们学会了专注与耐心，拉近了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这种充分将美术、数学、三维空间等知识融会贯通的博物馆教育活动，使孩子们体验到了学习、创造的乐趣。



TIME

11月11日

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

武进区博物馆

银装霓裳

——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

7月7日—8月27日，由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的“银装霓裳——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贵州省苗、侗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服饰280余件，累计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

此次展出的以苗、侗为主的民族服饰、银饰、刺绣精品，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精美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画卷。这些绚丽的民族服饰是黔东南少数民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精髓之一。通过展览，带领广大常武地区市民走进多彩美丽的黔东南。



TIME

7月7日—8月27日

银装霓裳——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
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



地道常州味

——常州吆喝非遗展

8月31日—10月8日，由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承办，常州一木四味空间协办的“地道常州味——常州吆喝非遗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常州本地民俗展品一百余件。开幕式上，我馆邀请常州华音长青艺术团吆喝队进行了现场表演、解说。

随着时代变迁，贮藏着童年记忆的常州老街巷逐渐被钢筋水泥的高楼所取代，老街巷里的声音、生活中的故事也逐渐飘散，记忆中的家园正在远去。而此次展览，是让更多的常州人再来聆听一次穿越时空的吆喝，在袅袅余韵中铺开儿时街巷的全景，唤起对故园旧巷的遥远记忆。留住乡音，不忘乡愁。



TIME

8月31日—10月8日

地道常州味——常州吆喝非遗展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主办

武进区博物馆承办

客家探秘

——福建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展

9月1日—10月29日，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的“客家探秘——福建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包括服饰、金银器、木雕等福建客家民俗精品106件(套)。

三明地处福建省西北部山区，二十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息。汉晋以后，中原汉族百姓逐渐南迁闽粤赣交界地域，与闽越等少数民族相融合，宋明时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题的客家民系。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三明成为海内外宗亲公认的客家祖地，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而多姿多彩。本次展出的实物精品，都是客家人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TIME

9月1日—10月29日

客家探秘——福建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展

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

“阳湖墨韵”丁酉重阳书画展

10月28日—11月6日，由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湖塘镇人民政府主办，武进区阳湖书画研究会、湖塘镇老年书画研究会、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阳湖墨韵”丁酉重阳书画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了阳湖书画研究会会员的书画精品80余件。

此次展览展出的八十余幅书画，是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展出基础上，凝聚全会之力，推出的精品力作。参展作者有老一辈书画名家白清源、史光新，也有阳湖书画研究会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实力派书画家。更值得一提的是叶鹏飞、戚散花等有全国影响的常武名家亦有作品参展，使展览大为增色。



TIME

10月28日—11月6日

“阳湖墨韵”丁酉重阳书画展

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湖塘镇人民政府主办

武进区阳湖书画研究会、湖塘镇老年书画研究会、武进区博物馆承办

金玉满堂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

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1月28日,由南京江宁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在我馆举办。

展览共展出南京江宁区博物馆馆藏两汉至明清金、银、玉器等精品文物85件(套),造型别致、纹饰精美,与我馆馆藏金、银、玉器交相辉映,展示出古代金、银、玉器的独特魅力,为常武地区观众带来一场非凡的视觉盛宴。



TIME

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1月28日

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
南京江宁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主办

情系武进 笔绘家乡

——何文斌书画篆刻展

11月11日—11月16日，由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春秋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武进区博物馆、镇江市大吉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情系武进 笔绘家乡”何文斌书画篆刻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何文斌先生书画篆刻作品73件。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何丕洁，区政协副主席陆雅芬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何文斌出自武进何墅何氏，先后师从谢翼卿、吴闻修，擅长山水、花鸟、人物，同时集书法、篆刻技艺于一身，现为镇江“新京江画派”成员，镇江水墨丹青书画院院长，专职书画家。举办此次展览，既是响应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号召，也是继承何氏宗族“爱国爱家，奋发有为”家家家训的实际行动。



TIME

11月11日—11月16日

情系武进 笔绘家乡——何文斌书画篆刻展

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春秋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武进区博物馆、镇江市大吉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

2017年,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与武进区博物馆进行了展览交流活动,继7月“银装霓裳·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在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展出后,我馆的“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于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在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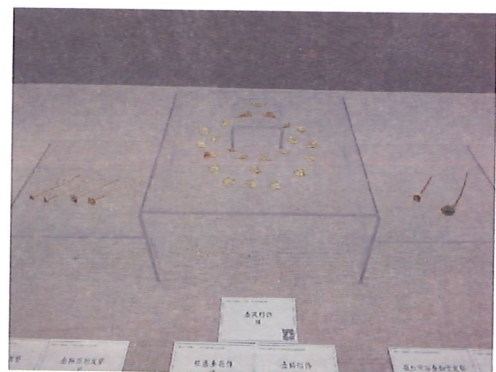
此次展览精选了我馆馆藏明清时期金银饰品、常州玉润堂收藏明清文房玉器120余件(组)进行展出。藏品再现了明清女子金饰插戴之华美、士人文房用玉之精致。通过展览,让公众一起探求当时社会生活之幽微,重现一段金镶玉砌的江南浮世生活。



TIME

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

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
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主办



十年回眸

——未君中国画作品展

11月19日—11月26日,由江苏省画院、湖南省画院、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武进区博物馆、常州正宝堂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承办的“十年回眸——未君中国画作品展”在我馆举办。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画家萧玉田,武进区文广新局局长范正洪,武进区文联主席夏征征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未君本名彭卫军,斋号抱莲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代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本次展览共展出未君书画精品70余幅,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TIME

11月19日—11月26日

十年回眸——未君中国画作品展

江苏省画院、湖南省画院、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
武进区博物馆、常州正宝堂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承办



“彩墨共舞” 柳新生、王云龙书画联展

11月29日—12月10日，由常州市文广新局、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残联、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常州市收藏家协会主办，龙承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承办“‘彩墨共舞’ 柳新生、王云龙书画联展暨龙承博物馆开馆五周年庆典”在我馆举办。

柳新生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粉画艺委会委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书画艺委会委员等职。王云龙现为安徽省收藏家协会文房四宝收藏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四宝收藏委员会秘书长。

此次展览共展出柳新生、王云龙作品55幅。活动旨在传播当代书法绘画艺术文化，加强书法绘画艺术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地方书法绘画艺术文化的发展。



TIME

11月29日—12月10日

“彩墨共舞” 柳新生、王云龙书画联展

常州市文广新局、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残联、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常州市收藏家协会主办
龙承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承办



2017年7—12月武博纪事

7月,我馆被武进区委组织部评选为“2016—2017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7月7日—8月27日,由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的“银装霓裳——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在我馆举办。

7月18日—20日,我馆举办“七彩夏日——双城·非遗记”第三届武博夏令营活动。

7月—8月,我馆举办黔东南少数民族服饰精品展配套社教活动:“爱我中华——我喜爱的民族服饰(苗族篇、瑶族篇、壮族篇)”。

8月,我馆社教项目“武博有约——这里的节日有意思”被常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2016年度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项目;“宋人的一天”社教项目被常州市文明办评为2017年常州市第二届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优秀案例三等奖,武进区博物馆获优秀组织奖。

8月22日—27日,“一沙一世界”武博暑期沙画体验活动在博物馆少儿社教体验区举办,近70组亲子家庭参与。

8月22日,我馆赴苏州博物馆对馆藏狄卫星书法作品共计10套/88件进行了灭虫处理。

8月28日,我馆党支部开展八月份“统一活动日”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学习史志军书记《在区委十二届三次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在区级机关开展“党建工作督查月”活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围绕“‘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武进”,联系各自实际开展专题讨论。

8月31日—10月8日,由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承办,常州一木四味空间协办的《地道常州味——常州吆喝非遗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常州本地民俗展品一百余件。

9月1日—10月29日,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主办的“客家探秘——福建三明客家民俗文物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包括服饰、金银器、木雕等福建客家民俗精品106件(套)。

9月16日,我馆开展“博物馆的客家之旅——土堡诞生记”社教活动,共10组亲子家庭参与。

9月19日,讲解员孙斌参加江苏省文化厅官方微信“精彩江苏”联合腾讯大苏网举办的江苏“最美场馆讲解员”评选活动。

9月20日,我馆被常州市教育局评为“常州市优秀市级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

9月23日,我馆与牛塘四点钟学校联合举办“同在蓝天下·快乐同成长”关爱流动人口子女公益活动——“我是‘常州宁’”社教体验活动,近50名流动人口子女参与。

同日,我馆开展“爱我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博物馆写生课活动,共30名学生参与。

同日,武博大学生志愿者赴武进湖塘博物馆参观并商讨组建湖塘博物馆志愿者队伍。

9月27日,张宇、王丽娜赴南京博物院参加由江苏省文物局主办,江苏省社教专委会承办的江苏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示范项目评选会议。我馆“我去宋代健个身”社教活动在本次活动参评。

10月1日,我馆开展“欢聚武博·喜迎中秋”社教活动,25组亲子家庭参与。

10月21日,我馆组织亲子家庭前往夕阳红康乐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武博走进夕阳红·弹奏古音享天伦”重阳节联欢会活动,给老人们送去关爱。

10月12日,“常幼牵手武博·非遗走进校园”签约授牌仪式在常州幼儿师范学校举行。武进区博物馆馆长施建刚,副馆长张宇,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副校长杨丽萍出席授牌仪式。

10月16日—10月22日,芮路俊、金霆蔚赴南京大学参加2017年全省文博干部研修班。

10月17日—21日,张宇赴湖南、四川参加常州市博物馆学会组织的业务考察活动。

10月24日—25日,张宇、张彩英赴徐州参加江苏省博物馆学会藏品保管专业委员会2017年江苏省博物馆保管工作经验交流会。

武博纪事

10月28日—11月6日,由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湖塘镇人民政府主办,武进区阳湖书画研究会、湖塘镇老年书画研究会、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阳湖墨韵’丁酉重阳书画展”在我馆举办。

10月30日—11月1日,施建刚、金霆蔚赴四川自贡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博物馆“互联网+博物馆”案例分析与应用时间信息化培训班。

11月2日,施建刚参加常州市武进区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

11月5日,我馆与中国美术学院童创艺术馆合作,举办“博物馆寻宝写生记”社教活动。

11月6日—11月17日,我馆赴常州大学(武进校区)、常州机电学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45人。

11月8日—11日,施建刚、殷洁茹参加“第二届全国馆藏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技术培训班”。

2017年11月10日—2018年1月28日,由南京江宁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在我馆举办。

11月11日—11月16日,由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春秋淹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武进区博物馆、镇江市大吉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情系武进 笔绘家乡’何文斌书画篆刻展”在我馆举办。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何丕洁,区政协副主席陆雅芬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11月11日,我馆开展“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配套社教活动:“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共12组家庭参与。

11月13日,我馆开展消防安全疏散和灭火演练,邀请常州市安居防火教育培训中心教官为全体职工进行安全培训与消防器材使用指导。

11月16日,我馆党支部开展十一月份“统一活动日”活动。支部书记施建刚带领预备党员孙斌进行入党宣誓;学习“十九大文件精神”和《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集中观看专题节目《榜样》。

11月19日—11月26日,由江苏省画院、湖南省画院、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武进区博物馆、常州正宝堂文化艺术

品有限公司承办的“十年回眸——未君中国画作品展”在我馆举办。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画家萧玉田,武进区文联主席夏征征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我馆赴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举办“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时尚生活展”。

11月29日—12月10日,由常州市文广新局、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残联、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常州市收藏家协会主办,龙承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彩墨共舞’柳新生、王云龙书画联展暨龙承博物馆开馆五周年庆典”在我馆举办。

12月1日,施建刚赴无锡参加江苏省博物馆学会2017年度会员代表大会暨论文研讨会。

12月8日,我馆赴市行政中心参加常州市2017年“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优秀案例展评现场汇报,“‘元宵圆·花灯美’武博元宵节活动”获评二等奖。

12月9日,我馆再次开展“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配套社教活动:“给妈妈的首饰找个家”,共15组家庭参与。

12月12日,我馆党支部全体党员赴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开展十二月份“统一活动日”活动。

同日,博物馆全体团员参加区文广新局团支部组织的“绽放青春 凝聚你我”素质拓展活动。

12月15日—12月20日,由武进区牛塘镇人民政府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欢庆十九大翰墨歌盛世’牛塘镇书画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牛塘书画联谊会成员创作书画精品76件。

12月18日,衢州市党政代表团来我馆考察,常州市市长丁纯、副市长方国强、武进区区长戴士福等领导陪同。

同日,区文广新局在我馆召开2018年工作思路专题研讨会。

12月26日—29日,周璞赴南通参加2017年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

12月28日—29日,我馆赴太仓博物馆完成“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全省巡展”接展工作。

匠心巧器饰雍容——明代金发饰选粹



漆纱珠翠庆云冠



金佛像挑心



金云龙纹月牙形分心



金花镶嵌绿松石顶簪



蝴蝶牡丹花金簪



金圆发簪



金蝶花形簪



金牡丹花簪



金牡丹花簪(局部)



金牡丹花簪



圆形镂空凤凰牡丹花金帽花



圆形镂空凤凰牡丹花金帽花



馆藏 刘菊清梅竹寒鸟图